



山西大学2004届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

基督教的传播与近代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

姓 名 刘安荣
导 师 王守恩 副教授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史
学院(中心、所) 历史与旅游学院
学习年限 2001年9月—2004年7月

二〇〇四年六月

山西大学 2004 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基督教的传播与 近代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

姓 名： 刘安荣

导 师： 王守恩副教授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社会史

学 院： 历史与旅游学院

学习年限： 2001 年 9 月—2004 年 7 月

二〇〇四年六月

Thesis for Master's Degree, Shanxi University, 2004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of Shanxi Society

Name	Liu Anrong
Supervisor	Professor Wang Shouen
Maj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Research Direction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olleg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Study Period	2001.9~ 2004.7

June, 2004

中文提要

天主教、新教分别于 1620、1876 年传入山西。本文考察了 1949 年前天主教、新教在山西传入、传播的状况，剖析了传教士的传教手段、教徒的入教动机。在此基础上对基督教传播在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尝试性探讨。

本文第一部分以 1900 年为界，分别阐述了义和团运动前、后基督教在山西传播的概况。文章分析了清朝官方对基督教的政策、态度，考证了天主教、新教传入的时间、州县及两教教区的演变、教徒的数量和分布，以具体可靠的数字阐明基督教在山西传播地域的广泛，教徒人数的众多。此外，剖析了传教士的传教手段、教徒的入教动机，从而揭示出基督教得以在近代山西传播的原因，从外部看是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灾难，从内部看是传统农业文明衰落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例如教育、医疗、赈济功能低下、自然灾害频繁、毒品泛滥、民众物质生活贫穷、精神生活贫乏，以及统治者腐败、扰民虐民等等。

本文第二部分探讨了基督教传播对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所起的作用。首先文章说明基督教传播导致山西传统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村社组织中产生民教分野和冲突，这是社会结构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开端。其次，文章论述了传教士传入山西的新技术、新事物、新生活方式给山西民众的物质生产、生活及精神生活带来的变化，这是山西社会生活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再次，文章考察了基督教会山西举办的教育、医疗、赈济事业，说明了其在山西社会教育、医疗、赈济功能的现代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的结论：基督教在近代山西获得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发展，其根源是传统农业文明衰落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基督教的传播虽导致民教分化与冲突，但它对山西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基督教；传播状况；传教手段；社会根源；社会现代化

Abstract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were introduced into Shanxi in 1620、1876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inquires into the spreading course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in Shanxi before 1949 .It analyses the missionaries' working way and the believers' motive to join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too. At the basis of the above, it looks into the effect the spreading of the religion to Shanxi society's modernization.

In the first part, by dividing the spreading course into two periods according to 1900,it respectively inquires into the spreading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Boxers' Movement, and analyses the policy and attitude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religion. It also studies the counties accepting the religion, the believers'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evolvement of the religious region. The specific reliable numbers testify that the region the religion spreading is wide and the number of the believers is great. Besides, the analysis of the missionaries' working way and the believers' motive to join the religion reveals the social causes that it could gain a foothold and develop in Shanxi society .The external cause is the intrusion of the foreigners. The internal ones are the lowering of educational function, medical function and relieving function, the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inundation of drugs, the poverty of the people's material life, and the poor of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which were led to by the declin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rulers' corruption, maltreatment to the people.

In the second part, this article inquires into the effect the spreading of Catholicism, Protestantism to Shanxi society's modernization. Firstly, it explains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religion's spreading leading to, and this was the start that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evolved into the modern one. Secondly, it expounds the new technology, new things, new living style that the missionaries brought into Shanxi changed the people's material production, material life and spiritual life. These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life. Thirdly, it investigates the causes the church ran in Shanxi, such as schools, hospitals, relieving work,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urch had had effect in the transform of Shanxi society in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y work, and relieving work.

Conclusion: Catholicism and Protestantism had had som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n Shanxi. The causes are the problems the decline of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leading to. The spreading of the religion had had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hanxi.

Key Words:

Christianity; spreading situation; spreading way; social causes; social modernization

目 录

绪论	1
一 基督教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传播	2
(一) 基督教的传入与初步传播	2
(二) 基督教在山西的迅速发展	9
(三) 基督教在山西得以传播的社会根源	15
二 基督教传播与山西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早期现代化	21
(一)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	21
(二) 社会生活的变迁	23
(三) 对贩毒、缠足恶风陋俗的冲击	25
三 基督教的传播与山西社会功能的早期现代化	27
(一) 教育功能的扩大的变迁	27
(二) 医疗卫生功能的发展与变迁	35
(三) 灾荒救治功能的变迁与提高	40
结语	43
参考文献	44
致谢	45

绪 论

天主教和新教都属基督教，分别于 1620 年、1876 年传入山西。经过在近代传播，它们终于在山西立足、发展起来，基督教的传播给传统山西社会注入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带来了具有现代性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山西社会的变迁，对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起了重要的示范、促进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基督教在近代山西传播的状况，只有初步研究（参看拙文《17~19 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于《晋阳学刊》2003 年第 3 期）；对于近代山西民教冲突的考察，仅有行龙、赵英霞的《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载于《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和王守恩的《19 世纪后期山西农村社会的分化与组合》（载于《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山西的传播状况及整个近代时期基督教传播与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笔者至今尚未见到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详细考察基督教在近代山西传播的状况，揭示其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社会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基督教传播与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揭示基督教传播在山西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国内史学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研究先后有过三种范式：一是“文化侵略”范式，二是“文化交流”范式，三是现代化范式。“文化侵略”范式是指西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通过其文化活动为西方的政治、经济侵略服务。这种范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前评价中西关系，特别是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唯一范式。其代表作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然而单纯用“文化侵略”范式来考察传教运动是不全面的，其症结在于“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把政治宣传当作学术话语，将局部扩大为全体”。^①20 世纪 80 年代初，产生了文化交流范式，它把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视为中西两大文化相遇交流的过程。文化交流范式忽视了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与平等意义上的文化交流的不同，也有一定局限性。到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现代化范式，其代表作是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现代化范式既不是单纯从政治角度诠释传教士活动的意义，也不大关注传教士的布道活动及其宣教功能，而主要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借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传教运动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社会演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侧重考察传教士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多有肯定。^②

由于本文要在考察基督教传播状况的基础上，探讨基督教传播与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所以笔者采用了现代化范式。此外，对宗教社会学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

^①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103 页。

^②同上文，89 第 88~页。

的理论，也有所借鉴。

一 基督教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传播

（一）基督教的传入与初步传播

1582年，天主教继唐、元之后再次传入中国。由于当时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采取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西洋科学技术的传教手段，因而获得了在华传教权，并且有许多上层官僚纷纷入教。清初，清廷沿用明代的政策，允许天主教传教，而且重用一些懂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到1664年，天主教内部发生“礼仪之争”，导致中国士人的仇教和康熙皇帝对天主教态度的转变。1706年，康熙皇帝实行部分禁教政策，即没有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并且不服从中国礼仪的传教士不准在华传教，一律返回欧洲。^①雍正继位后，又于1724年实行严厉禁教政策，不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严禁中国人入教。直到鸦片战争之后，1844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始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建堂传教。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又允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游历、传教。此后天主教及新教在中国各地逐渐传播开来。

在山西，1900年前是基督教传入、立足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传入较早、势力较大的是天主教。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广泛结交上层官僚，一些官吏如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入教。当时，山西绛州人韩霖在北京为官，与徐光启相交，亦领洗入教。在京的绛州绅士段袞与韩同入。1620年韩、段邀请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艾儒略到绛州传教，为其家属18人授洗，天主教从此传入山西。^②此后到1844年，是天主教在山西传播的第一阶段，即传入和立足阶段。

1624年，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金尼格来绛州定居传教，建起山西第一座天主教堂。他也是山西境内的首任本堂神父。1625年金尼格调走后，意大利耶稣会教士高一志来到绛州。他在山西传教15年，建立教堂15所，授洗8000余人，1640年卒于绛州。

高一志死后，德国人万密克负责主持晋南教务，1644年被农民起义军杀于蒲州。此后到1665年，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金弥格主持山西全省教务。

1696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9个代牧教区，山西是其中之一。山西首任代牧主教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张安当，从此山西教务脱离北京管辖。1705年张安当卒于太原，当时全省有教徒3000余人。此后11年山西主教告缺。1716~1844年，山西陕西合并为山陕教区，山西教务归陕西主教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安多尼·拉基兼管。期间清廷于1724年下令禁教，但该教在山西并未禁绝，仍在非法传播。1844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② 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版，第57辑，第849页。

年清廷弛禁后，罗马教廷另设山西代牧区，任命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杜喜伯为山西教区代牧。杜喜伯于1845年在文水新立村领受晋升主教的祝圣仪式，当时山西有教徒七、八千人。^①此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晋，深入各地城乡传教。天主教在山西的传播进入第二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它逐步在山西传播开来。

杜喜伯主持山西教务20多年，于1870年辞职回国。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江类思继任主教。1876年，江氏申报教廷，任命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艾士杰为助理主教。由于江氏年老多病，山西教务实由艾氏负责。随着教徒的增加，教务繁忙，罗马教廷于1890年将山西教区划分为南、北两境。北境教区包括大同、太原、朔县等51州县，时有教徒一万三千余人；由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管辖，因主教座堂设于太原，也称太原教区。南境教区包括长治、凤台、洪洞等54个州县，时有教徒约9000余人，归荷兰方济格会教士管辖，因主教座堂设于潞安，亦称潞安教区。此后十年，天主教在山西发展更快，教徒数量大增。

到1900年，天主教已传入山西的60个州县，以及口外七厅（当时隶属山西）。详见表1：

表1 至1900年天主教传入的州县^①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阳曲	1633	太原	同治年间	榆次	乾隆年间	太谷	1780	石楼	1894年左右
文水	1745	汾阳	1689	祁县	1644	徐沟	康熙末年	交城	光绪初年
平遥	1782	介休	1620	孝义	1877	宁乡	1887	临县	1870
屯留	1684	永宁	1893	长治	康熙年间	长子	咸丰年间	襄垣	1810年前
潞城	1645	壶关	康熙年间	临晋	1889	永济	1631 ^②	绛州	1620
隰州	1875	蒲县	1899	霍县	1861年前 ^③	灵石	1860	大同	1840年后
高平	1786 ^④	和顺	1900年前 ^⑤	阳城	1857	怀仁	1900	陵川	1877
沁州	1900年前 ^⑥	沁水	1877	榆社	1879	凤台	1889年前	岳阳	1862年前 ^⑦
武乡	1889	临汾	1626年后	平定	1890年前	解州	1900年左右	曲沃	同治年前
翼城	1900	襄陵	1877	汾城	略晚于	乡宁	1895	阳高	1890年

^①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版，第57辑，第851页。

					1877				前
天镇	1861	忻州	康熙年间	左云	1890	朔州	1878	洪洞	1624
五台	1877 ^①	神池	1889	崞县	1893 ^②	浮山	1900年前 ^③	黎城	1900年前 ^④
归绥	咸丰年间 ^⑤	萨拉齐	1875 ^⑥	宁远	1750 ^⑦	托克托	1895	和林格尔	1890年前
丰镇	1860~1870 ^⑧	清水河	1900年前 ^⑨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新修各县志及《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李金华编 中华书局 1997)

②此年代来源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7辑第849页。(赵政民编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2年出版)

③此年代来源于《教务教案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台北中研院 1974~1981年刊行)第三辑,第719页。

④此年代来源于《晋城市志》(秦海轩主编 中华书局 1999年出版)第2014页。

⑤⑥新修《和顺县志》《沁县志》均记为1900年后,但据《近代史资料》总75期载《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1900年前和顺、沁县已有天主教徒。

⑦此年代来源于《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716页。

⑧⑨此年代均来自《忻州地区宗教志》(范堆湘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84页。

⑩此年代来自《拳祸记》(李著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23年印行)下册,第405页。

⑪此年代来自《拳祸记》下册,第398页。

⑫此年代来自《绥远通志稿》(傅增湘编)卷81。

⑬此年代来自常非著《天主教绥远地区传教简史》中册,第43页。

⑭此年代来自《边疆的公教事业》(王守礼著 北京上智编译馆 1947年出版)第33页。

⑮此年代来自《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载戴学稷著《190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在“口外七厅”和伊盟等地的发展》。

⑯本年代来自《拳祸记》下册,第312页。

至于天主教徒的数量,到1900年北境教区有17000余人,南境教区有18000余人。^①然而,当时的北境未将口外七厅包括在内,因此山西的天主教徒人数应再加入口外之数。据义和团运动后山西官方与教会订立的《山西口外七厅教案合同》载明:当地天主教徒有22470余人,^②因此1900年山西约有天主教徒57470人。

新教传入山西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代表苏格兰圣经会在华活动的英国伦敦会牧师韦廉臣和理一视于1869年至1870年游历北方期间涉足山西。^③然而,最先在山西传教的是内地会的特纳和詹姆斯。他们于1876年10月17日从镇江出发,经安徽、河南一带于11月15日进入山西布道,1877年春在太原府设立总站,教

①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2年版,第2辑,第82~83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 1998年版,第3册,第605页。

③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426页。

济饥民、病人。^①1877年11月底他们因患病于李提摩太到达前2日离去。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牧师。他在山东传教期间遇旱灾，其赈灾措施及传教活动卓有成效。因此在1877年山西发生奇荒时，新教的上海赈灾委员会派其来山西放赈传教。李氏于1877年11月底到达太原，他是英国浸礼会到达山西的首位传教士。^②

1878年3月上海赈灾委员会又派英国循道会牧师李修善，内地会牧师特纳和北美长老会牧师惠廷携带四、五千英镑到达山西。1879年平阳府设了内地会总站。至1881年内陆地会游行布道，除了两个城市外，及于山西全省各城。不久以后，这两个城市也访问到了。^③

1900年义和团运动前，是新教在山西传入立足的阶段。据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折，当时传入山西的新教差会主要有五个：浸礼会、内地会、公理会、自立会、宣道会。^④

英国浸礼会：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太原设立总站，此后向北发展到忻州、代州、崞县、繁寺、定襄、宁武等地，向南发展到榆次、交城等地。大同、归化于1886年设立总站，包头则于1888年开设为总站。

内地会系统包括英国内地会、瑞华会、瑞典圣洁会、挪威会、瑞华盟会五个差会，是传入山西地域最广的新教差会。义和团运动中“内地会之案地方最多，省南北计有50余州县”^⑤1876年英国内地会的特纳和詹姆斯曾在泽州府、平阳府布道。1876年特纳和李修善分别在太原和平阳“首创差会总堂两所”。^⑥此后该会又传至晋中、晋东南和运城地区北部，并在晋北，晋西北及口外开辟了教区。

瑞华会于1886年传入安邑县，后扩展至猗氏、解州、永济、芮城、荣河等地。

瑞典圣洁会于1894年传入右玉、左云、平鲁，后又传至浑源、应州等地。于1897年在绥远，1898年在浑源设站。

挪威会于1898年传入永宁县。

瑞华盟会于1886年在归化设立总堂，在口外大片地区布道。

美国公理会于1881年选定太谷，汾阳为其布道区。1883年文阿德、丁嘉立等正式在太谷布道，随后太谷公理会又传至祁县、平遥、沁源等地。该会于1887年正式建立汾州教区，汾阳公理会又传至孝义、永宁等县。

自立会由一些从英国内地会分化出来的传教士于1891年在太原、寿阳创立，分别称为“山西耶稣教自立会”、“寿阳耶稣教自立会”，在太原、寿阳、阳曲等地传教。

宣道会（创立于美国，由美、英、瑞典等国传教人员组成）1893年进入由英国内地会传道的归化、保德等地，以后逐步接管了当地的教务，并在口外大片地区开辟了许多传教点。1900年前，该会已在天镇、阳高、丰镇、归化、萨拉齐、

^①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版，第492页。

^②Paul Richard Bohr：《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77，第100页。

^③同上汤清书，第492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册，第190页。

^⑤同上书，第3册，第192页。

^⑥司德敷：《中华归主》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上册，第385页。

包头、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等地设立了总站。^①

到 1900 年，新教已传入山西 69 个州县及口外七厅。详见 2 表：

表 2：至 1900 年新教传入的州县及其所属差会^①

县名	传入年代	所属差会	县名	传入年代	所属差会	县名	传入年代	所属差会
太原	1876	内地会	阳曲	1878	英浸礼会	孝义	1887	内地会
	1877	英浸礼会			自立会			公理会
	1891	自立会						
太谷	1883	公理会	祁县	1889	公理会	交城	1891	浸礼会
汾阳	1887	公理会	徐沟	1889	内地会	榆次	1897	英浸礼会
平遥	1888	公理会	永宁	1898	挪威会	沁源	1895	公理会
		内地会		1889	公理会			内地会
介休	1889	内地会	长治	1887	内地会	屯留	1896	内地会
潞城	1889	内地会	安邑	1886	瑞华会	平阳	1878	内地会
洪洞	1883 ^a	内地会	乡宁	1894	内地会	岳阳	1889	内地会
曲沃	1885	内地会	翼城	1897	内地会	吉县	1889	内地会
永济	1896	瑞华会	荣河	1899	瑞华会	绛州	1898	内地会
猗氏	1891	瑞华会	解州	1895	瑞华会	芮城	1897	瑞华会
河津	1892	内地会	霍县	1885	内地会	汾西	1887	内地会
灵石	1889	内地会	赵城	1885	内地会	隰州	1885	内地会
大宁	1879 ^a	内地会	蒲县	1887	内地会	应州	1898 ^d	圣洁会
右玉	1894	圣洁会	浑源	1894 ^b	圣洁会	左玉	1894	圣洁会
平鲁	1898	圣洁会	忻州	1884 ^b	英浸礼会	定襄	1893	英浸礼会
大同	1886	宣道会	寿阳	1841	自立会	保德	1884	内地会
	1886	内地会		1890	内地会		1893	宣道会
代县	1891	浸礼会	宁武	1900 年前	浸礼会	崞县	1892	浸礼会
繁寺	1895	浸礼会	永和	1898	内地会	襄陵	1900 年前	内地会
宁乡	1900 年前 ^a	内地会	襄垣	1900 年前	内地会	壶关	1900 年前	内地会
黎城	1900 年前 ^①	内地会	沁水	1900 年前	内地会	高平	1900 年前	内地会
陵川	1900 年前 ^①	内地会	武乡	1900 年前	内地会	文水	1900 年前	内地会
稷山	1900 年前 ^①	内地会	绛县	1900 前 ^①	内地会	晋城	1900 ^①	

^①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7 页。

阳高	1898年前 ^①	圣洁会	天镇	1887 ^②	圣洁会	河曲	1900年前 ^③	圣洁会
	1900年前	宣道会		1900年前	宣道会			
归绥	1884	内地会	萨拉齐	1881 ^④	圣洁会	和林格尔	1900年前 ^⑤	宣道会
	1886	瑞华盟会		1894	宣道会			
	1893	宣道会						
清水河	1900年前 ^⑥	宣道会	宁远	1900年前 ^⑦	宣道会	托克托	1900年前 ^⑧	宣道会
丰镇	1893 ^⑨	宣道会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中华归主》下册，第1103-1104页，及《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②本年代来自扈石祥编《洪洞基督教史》第5页。

③本年代来自《大宁县志》（冯岩编 海潮出版社1990）第469页。

④本年代来自《雁北宗教志》（山西雁北行署民族宗教处1986）第152页。

⑤本年代来自《雁北宗教志》第151页。

⑥本年代来自《忻州地区宗教志》第251页。

⑦本年代来自《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汤清著 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409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均据《清末教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合编 中华书局1998）第3册，第207-208页载《内地会教民房屋连恤在内赔款细数单》。

⑲本年代来自《绛县志》（秦富元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63页。

⑳本年代来自《晋城市志》（秦海轩主编 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第2013页。

㉑本年代来自新修《阳高县志》（郭海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08页。

㉒本年代来自《天镇县志》（逯廷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第912页。

㉓据《近代史资料》总75期载《光绪二十六年份山西教案识略》，当时河曲县有瑞典教堂一所。

㉔㉕㉖㉗㉘㉙均据《绥远通志稿》卷81。

将天主教与新教合计起来，到1900年山西已传入基督教的州县有91个（其中48个既有天主教又有新教），占州县总数（108个）的84.3%。

至于教徒数量，新教人士曰1898年该教有1513人。^①此后二年中，其数量应又有所增加。加上天主教徒，1900年全省约有基督教徒5.9万人，占人口总数（1898年为1153万）的5.1‰。

基督教徒在山西的分布很不平衡。在口外，教徒的数量既多又集中，有些村庄全是教徒，形成大小不等的教民村。有些村庄民教杂处，但村内教徒也多少悬殊。下以内蒙古西南教区的7个教民村为例，说明口外教徒分布的大致情形。

表3：天主教内蒙古西南教区7村1894年教徒分布^②

^①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7页。

村名	教堂成立年	教徒人数	村名	教堂成立年	教徒人数
二十四唤地	1881	800	小淖儿	1887	500
程奎海子	1891	113	大喇嘛窑子	1891	109
商人窑子	1891	47	银匠窑子	1892	305
大淖儿	1892	60			

①本表资料来自常非著《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第38页。

口内也有少数教民村，也是大小不等。如襄垣县寨沟村，居民二、三家，俱奉教。民教杂处之村，在口内居多，各村教徒从一户到一千人不等。如沁州东坡有一家教徒，绛州刘峪村居民约一千家，教徒十余家，徐沟县清源乡梁泉道有教徒600余人，长治县马厂村有教徒1000人。^①

各个州县的教徒人数也相差很大。笔者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口内一些州县的教徒人数做了初步统计，制成表4、表5，以揭示口内教徒分布大概情形。

表4：1900年天主教徒在部分州县的人数^①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阳曲	200余人	忻州	800余人	神池	30余人	榆社	215人以上	太谷	20人以上
陵川	20余户	襄垣	近300人	临晋	212人	临汾	10户以上	潞城	800余人
平定	40余人	清徐	数百人	屯留	1530多人	绛州	千余人	乡宁	70余人
孝义	20人以上	大同	48人以上	临县	200余人	武乡	500户	凤台	650人以上
左云	83人以上	霍州	百十人	永宁	10人以上	高平	174人以上	壶关	400人
怀仁	60余人	阳城	500余人 ^②	沁州	四户 ^③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新修各县县志。

②本数字来自《阳城方史资料》第1辑第169页。

③本数字来自《拳祸记》下册，第414页。

表5：1900年新教教徒在部分州县的人数^①

①李桂《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版，第385、414、408、357、374页。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平遥	130 余人	荣河	30 人	翼城	20 余人	永和	5 人	大宁	300 余人
稷山	1 户	孝义	200 余人	襄垣	60~70 人	长治	20 多人	应州	20 多人
阳高	11 人以上	代州	70 余人	右玉	100 余人	寿阳	70 人以上	太谷 ^②	约 150 人
繁寺	20 多人	忻州	30 多人	乡宁	近 110 人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新修各县志及《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爱德华兹著 李喜所等译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②此数字来《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 21 辑, 第 814 页。

(二) 基督教在山西的迅速发展

1901 年后是基督教在山西迅速发展的时期。

1900 年前, 清廷虽然对基督教全面开禁, 但山西地方官却都持明弛暗抑政策。义和团运动失败后, 各地方官不再明弛暗抑, 转而采取了护教政策, 执行了议结教案章程中的规定: “地方文武皆有保护教堂、教士、教民之责, 应加意防范”。^①官方护教政策的实行, 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

1901 年后天主教传播区域扩大, 教徒人数猛增。

1902 年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凤朝瑞来太原任主教。他于 1905 年建成大北门街的大教堂, 还在各地修建了大小教堂 67 座。在 1910~1915 年的短暂离职后, 1916~1940 年凤朝瑞复任主教, 又修建了大型教堂 97 座, 小型教堂 536 所。当时增加的教徒为庚子年的 6 倍余。^②

由于教徒增加, 教务繁忙, 天主教从北境教区中划出了许多教区。

1923 年, 划出大同教区, 由荷兰圣母圣心会传教士管理, 它包括大同、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 6 县, 时有教徒 1600 余人。

1926 年划出汾阳教区, 辖汾阳、孝义、平遥等 15 县, 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称为“国籍教区”), 时有教徒 11000 余名。

1926 年复划出朔县教区, 辖朔县、宁武、偏关等 15 县, 由德国方济格会教士管理, 时有教徒 4335 人。

1932 年划出榆次教区, 辖榆次、太谷、祁县等 10 县。时有教徒 1300 余人, 由意大利方济格会教士管辖。

山西南境教区在庚子年之后由荷兰方济格会教士翟守仁任主教。他在 25 年的任期中使教徒增至三万余人。翟守仁于 1926 年辞职, 由荷兰籍教士苗其秀继任, 此后南境教区中也划出一些教区。

1932 年划出洪洞教区, 归中国神职人员管理, 辖洪洞、临汾、隰县等 13 县, 当时约有教徒五六千人。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 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第 3 册, 第 231 页。

^②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2 年版, 第 2 辑, 第 83 页。

1936年划出绛州教区，属荷兰方济格会教士管理，辖新绛、稷山、闻喜等22县。

笔者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发现到只有岚县、万泉、芮城、保德四县没有关于天主教的记录，姑且断定此四县没传入天主教。1914年口外七厅从山西划出；同年山西设清源县、平顺县、昔阳县，1918年设方山县，因此1949年以前山西有105县，其中101个有天主教徒。表6说明了1901年后天主教传入的县份。

表6：1901年后传入天主教的县份^①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县名	传入年代
兴县	1915	岢岚	1915	荣河	1924	安邑	1931年前	虞乡	清末
平陆	1931年前	河津	清末民初	闻喜	1929	稷山	清末	垣曲	1920
绛县	1904	永和	民初	赵城	1909年前	孟县	1916	寿阳	1917
沁源	1914	浑源	1919	应县	1934	平鲁	1935	定襄	1912
灵丘	1902	代县	1932	繁峙	1913	辽县	1933年前 ^②	河曲	1926年前 ^③
猗氏	1931年前	夏县	1931年前	大宁	1931年前	右玉	1931年前	偏关	1931年前
五寨	1931年前	昔阳	1921	清源	1931年前	方山	1893 ^④	宁武	光绪年间
平顺	1931年前	静乐	1902	汾西	清末民初	吉县	民国初年	山阴	1931年前
广灵	1915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近年新修各县县志及《山西历代人口统计》（赵张正明、赵云旗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②本年代来自《山西省大观》第376页。

③本年代来自《雁北宗教志》第112页。

④1918年设方山县。

表7：1934年山西各县天主教人数^①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平遥	9610	太原	1954	榆次	218	太谷	17	祁县	354
徐沟	203	交城	310	文水	1515	兴县 ^②	2	岢岚	26
汾阳	403	平遥	504	介休	374	孝义	70	石楼	53
宁乡	422	临县	604	清源	1498	离石	564	方山	374
长治	1307	长子	984	屯留	7338	襄垣	1120	潞城	3979
壶关	1046	黎城	442	平顺	12	晋城	329	高平	137
阳城	232	陵川	822	沁水	96	辽县	9	和顺	45
榆社	201 ^③	沁县	51	沁源	39	武乡	628	平定	378
昔阳	3 ^④	孟县	218	寿阳	91	临汾	11	洪洞	399

浮山	102	乡宁	117	安泽	662	曲沃	343	翼城	228
汾城	1169	襄陵	228	吉县	14	汾西	90	灵石	94
赵城	930	隰县	3719	蒲县	60	大宁	183	永和	90
永济	257	临晋	87	虞乡	101	荣河	1	猗氏	8
解县	40	安邑	47	夏县	28	平陆	324	新绛	184
垣曲	427	闻喜	69	绛县	11	稷山	123	河津	8①
霍县	500	五台	17680	崞县	780	繁寺	11	河曲	13
宁武	16	偏关	3	神池	156	五寨	7	忻县	1985
定襄	252	静乐	447	代县	202	大同	1917	怀仁	507
山阴	943	阳高	343	天镇	280	广灵	272	灵丘	212
浑源	798	应县	8	右玉	203	左云	127	平鲁	91
朔县	3597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山西省大观》(日本山风师团编,山西省史志院编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此为1931年之数。

③此为1933年之数。

④此为1931年之数。

⑤此为1933年之数。

1901年后,原传入山西的各新教差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

英国内地会派遣30余名教士进入山西,恢复教务。1906年起该会把传教重点放在太原以南和晋东南地区;至1920年,恢复和续建总堂19座,正式教堂126座,有教徒3694人。此后,以各地总堂为中心向广大偏僻乡村辐射,设立了大批支堂。

瑞华会不仅恢复了原有教区,还扩散至夏县、临晋、虞乡、万泉,平陆等县。到1919年共有总堂5座,正式教堂15座,教徒521人。1922年,该会改为晋秦豫信义公会。

瑞典圣洁会1901年接管了原宣道会在晋北的教区,1906年又接管了英国内地会在大同及晋北的布道区,教务发展日甚一日。至1902年,该会在晋北有7座总堂,15座正式教堂,教徒787人。此后又在各地设立大批支会,教徒增至数千人。

挪威会除恢复永宁县的教务外,至1915年又传至临县、静乐、岚县、兴县,后又传至岢岚、河曲、保德、宁武,时人称之为“西八县教会”。到1920年共有总堂9座,正式教堂7座,教徒116人。30年代该会教务又有发展,教徒继续增多。

瑞华盟会恢复了晋蒙交界的教务,1902和1903年分别在天镇、萨拉齐设总堂。

英国浸礼会1901年后接管了山西耶稣教自立会和寿阳耶稣教自立会的教务,并向北向南发展。到1918年该会布道区占全省总面积的20%,有总堂3座,正式教堂17座,教徒675人,1924年该会在太原的教徒达近千人。

美国公理会以太谷、汾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至1919年该会布道区占全省总面积的8%。1920年汾阳公理会教徒发展到3000人,1924年太谷公理会有教徒1362人。

除上述原有差会外,新教还有新差会进入山西。它们是:美国友爱会、神召会、使徒信心会、青年会、救世军、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华北圣公会等。

美国友爱会属浸礼会体系。1910年美国友爱会牧师库范格开辟平定教区,到1917年

已传入寿阳、辽县、昔阳、和顺、榆社、孟县、太原、阳泉；1918年有总堂2座，正式教堂3座，教徒255人。1933年该会特邀上海伯特利环球布道团来平定讲道，吸引了许多群众，一次授洗多达600余人。

神召会分为二支，一支为美国神召会，一支为泽州神召会。美国神召会于1902年由挪威教士达亚平传至平定。1914年美国传教士又在太原设总堂，此后以太原为中心向南、北发展。

1902年原英国内地会牧师司米德夫妇至泽州创立神召会，后传至高平、陵川、沁水、阳城，1919年该会传教区域占全省面积的4%。

使徒信心会1910年传入山西东北部浑源等地，并在平定设了传教点。至1920年该会在阳高、大同、应州设总堂3座，正式教堂10座，有教徒600余人。

青年会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1910年前基督教青年会传入太原，后传至汾阳、大同。30年代初女青年会在太原出现。

华北圣公会于1913年在孟县设立福音堂，1924年又在大同设堂布道。

救世军于1918年由英国女军官费某传至大同，后传至太原。1919年在太谷设分部，后传至汾城、榆社。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于1926年由美国教士在太原开堂布道，同年传至榆次，1930年在运城设分会。该会还传至霍县、屯留、长子、汾阳、忻州、大同等地。

此外，自20世纪初起一些中国教徒创立自办的教会组织，山西教牧人员先后创立加入了真耶稣教、天召会、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等组织。

到1949年，全省各州县都传入了新教。

表8：1901年后传入、成立的新教差会及所在州县^①

县名	传入年代	差会	县名	传入年代	差会	县名	年代	差会
太原	1910年前	青年会	榆次	1905	公理会	大同	1913	使徒信心会
	1914	神召会		1918	神召会		1918	救世军
	1917	友爱会		1926	安息日会		1919	神召会
	1918	救世军		1932	救世军		1924	圣公会
	1921	天召会		1946	基督徒聚会处		1931	基督教青年会
	1921	真耶稣教					1934	安息日会
	1926	安息日会						
	1930年左右	基督徒聚会处						
	1930年后	女青年会						
临县	1908	挪威会	岚县	1915	挪威会	兴县	1915	挪威会
文水	1910	公理会	屯留	1930年后	安息日会	中阳	1914	公理会
岢岚	1915年后	挪威会	长子	1908	内地会	山阴	1918	圣洁会
	1918	内地会		1930年后	安息日会		1920	神召会
汾城	1917	内地会	五台	1913	浸礼会	宁武	1915年后	挪威会
	1920	救世军		1916	神召会		1920	圣洁会

昔阳	1912	神召会	孟县	1913	圣公会	沁县	1913	圣公会
				1917	神召会			
		友爱会			友爱会		1918	内地会
平定	1902	神召会	应县	1916	使徒信心会	太谷	1920	救世军
	1901	友爱会		1932	安息日会		1926年前	神召会
	1901	使徒信心会		1938	基督徒聚会处		1939	基督徒聚会处
运城	1909年后	基督教青年会	繁寺	1916年后	神召会	夏县	1903	瑞华会
	1926	真耶稣教			圣洁会		1926	真耶稣教
	1930	安息日会						
石楼	1915	公理会	平顺	1916	内地会	晋城	1902	神召会
怀仁	1912	圣洁会	祁县	抗战时	耶稣家庭	灵丘	1910	圣洁会
	1939	基督徒聚会处		1946	基督徒聚会处		1917年后	神召会
高平	1905	神召会	阳城	1915	神召会	陵川	1913	神召会
沁水	1915	神召会	辽县	1912	友爱会	寿阳	1915年后	友爱会
和顺	1915	友爱会	榆社	1916	友爱会	沁县	1918	内地会
阳高	1911	使徒信心会	广灵	1925②	圣洁会	崞县	1917	神召会
河曲	1915年后	挪威会	保德	1915年后	挪威会	朔县	1910	圣洁会
神池	1920年前	圣洁会	五寨	1920年前	圣洁会	静乐	1912	挪威会
浮山	1906	内地会	临晋	1906	瑞华会	虞乡	1913	瑞华会
万泉	1908	瑞华会	平陆	1928③	瑞华会	垣曲	1915	内地会
徐沟	1918	神召会	交城	1930前后	天召会	汾阳	1909年后	青年会
				1932	神召会		1932	安息日会
浑源	1910	使徒信心会	霍县	1930年后	安息日会	忻县	1932年左右	安息日会
洪洞	1931	真耶稣教	赵城	1919	真耶稣教	安邑	1926	真耶稣教
侯马	1933	真耶稣教	解县	1926左右	真耶稣教会	汾西	1931	真耶稣教
猗氏	1943	基督徒聚会处	荣河	1943年后	基督徒聚会处	方山	1931年前④	
清源	1931年前⑤	公理会	闻喜	1904	内地会			

①本表资料主要来自《中华归主》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

②本年代来自《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503页。

③本年代来自平陆文史资料第20期第4页。

④⑤年代均来自《山西历代人口统计》。

1934年，山西的新教徒有45066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1601000人）的3.9%。

表9：1934年山西各县新教徒人数^①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县名	教徒人数
万泉	15	猗氏	145	解县	75	安邑	51	夏县	155

洪洞	493	浮山	104	乡宁	34	安泽	132	曲沃	137
崞县	252	繁寺	319 ^②	保德	300 ^③	河曲	112	宁武	46
静乐	79	代县	188	大同	1024	怀仁	206	山阴	280
绛县	14	稷山	226	河津	200	霍县	151	五台	17837
翼城	101	汾城	1629	襄陵	101	吉县	32	汾西	959
阳高	126	天镇	342	广灵	159	灵丘	881	浑源	788
应县	29	右玉	90	左云	143	平鲁	130	朔县	819
潞城	461	壶关	45	黎城	11	平顺	4 ^④	晋城	147
灵石	99	赵城	993	隰县	1526	蒲县	40	大宁	1917
高平	88	阳城	150	陵川	54	沁水	53	辽县	27 ^⑤
和顺	24	榆社	262	沁县	32	沁源	162	武乡	18
平定	303	昔阳	168 ^⑥	孟县	34	寿阳	82	临汾	152
阳曲	57	太原	110	榆次	89	太谷	186	祁县	132
方山	302	长治	138	长子	10	屯留	685	襄垣	94
清源	350	岢岚	37 ^⑦	汾阳	555	孝义	96	平遥	316
偏关	11	神池	38	五寨	93	忻县	853	定襄	44 ^⑧
交城	199	文水	309	岚县	99	兴县	55	徐沟	431
永和	128	永济	183	临晋	94	虞乡	78	荣河	64
平陆	71	芮城	160	新绛	186	垣曲	156	闻喜	219
介休	302	石楼	159	临县	557	中阳	143	高石	1212

①本资料主要来自《山西省大观》。

②此为 1931 年之数。

③数来自《保德县志》（保德县志编撰办公室，199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是抗战后人数。

④此为 1920 年之数，来自《中华归主》下册，第 1104 页。

⑤此为 1933 年之数。

⑥此为 1931 年之数，来自《山西历代人口统计》。

⑦此为 1933 年之数

⑧此为 1933 年之数。

1934 年，山西天主教、新教教徒人数合计为 125145，占人口总数的 10.79%，笔者从《山西历代人口统计》中摘出一些数字，制成表 10，以综合反映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达到的发展规模。

表 10：1931 年山西基督教徒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

县名	基督教徒人数		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县名	基督教徒人数		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县名	基督教徒人数		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比	
	天主教	新教	天主教	新教		天主教	新教	天主教	新教		天主教	新教	天主教	新教
省城	1301	117	1.18	0.11	孝义	80	118	0.06	0.09	阳曲	6197	63	3.41	0.03
平遥	722	689	0.30	0.28	太原	1798	131	1.72	0.13	介休	371	332	0.30	0.27

榆次	360	118	0.25	0.08	石楼	34	186	0.10	0.55	太谷	45	157	0.01	0.13
临县	2002	241	0.99	0.12	祁县	690	163	0.53	0.13	中阳	323	64	0.44	0.09
交城	85	618	0.08	0.62	离石	519	913	0.32	0.56	文水	792	192	0.49	0.12
方山	709	70	2.00	0.20	岚县		98		0.14	长治	1295	154	0.70	0.08
兴县	2	6			长子	460	77	0.30	0.05	徐沟	257	192	0.59	0.44
屯留	2959	576	2.45	0.48	清源	1374	335	1.61	0.39	襄垣	1249	184	0.84	0.12
岢岚	48	33	0.12	0.09	潞城	97692	5564	88.74	5.05	汾阳	60	1066	0.38	0.67
壶关	936	54	0.73	0.04	黎城	1006	281	1.27	0.36	昔阳	3	168		0.12
平顺	6		0.01		孟县	240	47	0.11	0.02	晋城	334	149	0.11	0.05
寿阳	105	76	0.06	0.04	高平	520	214	0.20	0.08	临汾	156	174	0.09	0.10
阳城	344	128	0.17	0.06	洪洞	147	106	0.27	0.20	沁水	92	51	0.08	0.04
乡宁	128	56	0.19	0.08	辽县		45		0.06	安泽	702	61	0.90	0.08
和顺	27	21	0.04	0.03	曲沃	541	127	0.57	0.13	榆社	221	56	0.37	0.09
翼城	286	93	0.28	0.09	沁县	76	102	0.09	0.13	襄陵	279	100	0.36	0.13
武乡	543	18	0.37	0.01	吉县	13	54	0.04	0.16	平定	281	303	0.09	0.09
永济	123	135	0.10	0.11	临晋	193	42	0.20	0.04	河津	1	96		0.09
虞乡	145	124	0.25	0.21	猗县	508	156	0.82	0.25	荣河	1	46		0.06
汾西	216	1000	0.43	2.00	万泉		37		0.04	灵石	134	151	0.15	0.17
猗氏	22	175	0.02	0.20	赵城	1170	915	1.34	1.05	解县	92	102	0.15	0.17
隰县	3607	2152	5.67	3.38	安邑	320	241	0.30	0.23	大宁	288	947	1.73	5.36
夏县	5	47		0.04	蒲县	344	65	1.07	0.20	平陆	386	45	0.41	0.05
永和	67	147	0.33	0.71	芮城		69		0.11	大同	1771	890	0.55	0.28
新绛	230	9	0.23	0.01	怀仁	534	299	0.67	0.38	垣曲	328	166	0.50	0.25
山阴	3	382	0.01	0.65	闻喜	278	113	0.20	0.08	阳高	494	97	0.38	0.08
绛县	120	2	0.18		天镇	481	509	0.43	0.45	稷山	84	33	0.08	0.03
广灵	331	141	0.36	0.15	灵丘	506	584	0.43	0.50	五台	612	23	0.31	0.01
浑源	334	545	0.18	0.30	崞县	558	130	0.21	0.05	应县	102	147	0.09	0.12
繁寺	42	319	0.04	0.28	右玉	111	122	0.13	0.14	保德				
左云	141	59	0.19	0.08	河曲	13			0.01	平鲁	9	77	0.03	0.23
朔县	2562	577	1.47	0.33	宁武	32	24	0.04	0.03	偏关	4	3	0.01	0.01
神池	26	6	0.07	0.02	五寨	7	44	0.01	0.09	忻县	1084	653	0.47	0.28
定襄	476	41	0.40	0.04	静乐	592	81	0.59	0.08	代县		100		0.09

(三) 基督教在山西得以传播的社会根源

山西民众的传统信仰是由佛教、道教及世俗信仰（大众宗教）共同构成的一个庞杂体系。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多神主义，二是偶像崇拜。而天主教、新教都是一神论，都

反对偶像崇拜。因此，要让山西民众放弃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转而去信陌生的天主、上帝无疑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么基督教为什么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在山西立足，并迅速发展起来？为什么山西民众从愚昧无知的农夫农妇到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子都有些人接受了基督教？以下笔者将通过教会传教方式及教徒入教动机的剖析，对此问题试做回答。

山西民众主要从以下几个途径接受基督教。

首先，父母的入教会直接影响到子女、后代。天主教是家传的。父母是天主教徒，其子女、后代必然是天主教徒。例如，1780 年在北京经商入教的毕锋银回家乡太谷县胡家庄发展教徒，至今已传 7 代，有教徒 81 名。^①新教虽不家传，但父母入教也会推动其子女入教。例如繁寺教徒高连登 1898 年入教，1900 年同其妻议定合家信道。该年 6 月其长子、长媳遂亦入教。^②

其次，配偶的入教会直接导致本人入教。基督教规定，教徒男子可娶外教妇女为妻，但非教徒如欲娶女教徒为妻，则必须先入教，外教妇女嫁给基督教徒后，一般也都随夫入教。介休三道河村康教徒入教，是因光绪年间娶教徒郭氏。^③光绪年间浮山县北韩乡霍寨村张福玉母嫁洪洞古罗村天主教徒南某为续弦，遂带张福玉入教。^④

再则，受亲友、邻里、同乡等人影响而入教的为数不少。例如 1860 年灵石县洪土村任兆贵迁居柏沟村，该村天主教徒任天良不断给任兆贵传授教义，久之任兆贵全家皆入教。^⑤平陆县西韩窑村石高升，在黑龙江谋生时入了基督教。1932 年返回故乡后，除自家人外，其弟全家亦入教。石高升还在本村、邻村传教，使当地教徒增至 100 人。^⑥

晋民入教的这些途径，充分反映了传统山西社会是以家庭结构为核心，以村社结构为基础的组 织特征。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由家属、亲友、邻里等组成，这其中的任何一点发生变化都可能波及 其余。其中，家庭是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它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又是一个人接受文化技能，思想信仰等教育的摇篮，家长的示范作用无可置疑，家庭成员的互相影响也不可低估，基督教在长期禁教中屡禁不绝，弛禁后传播发展起来，与上述情况密不可分。传统山西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是基督教传播的网络式渠道，也是其立足发展的基本社会根源。

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式还是传教士的布道，传教士是用以下几种方式宣扬教义、劝人入教的。

首先，传教士进行口头和文字布道。一些人通过聆听或阅读小册子，思想受到影响而转奉基督教。他们的入教动机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寻求现实安慰。近代的一些山西民众面对现实生活的贫困和天灾人祸的侵袭无力抵抗、摆脱。在当时信仰普遍盲目的状态下，人们感到诸天不聪，原有的儒、佛、道各教均告失灵。而基督教宣扬耶稣能让人解脱苦难获得幸福，一部分人从中获得心理安慰而入教。例如：1879 年住在隰县的郭居仁从潞安府引荐英籍陆牧师到隰县传教。由于灾荒

^① 郭齐文：《太谷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7 页。

^② 柴莲藕：《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3 页。

^③ 侯柏清：《介休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66 页。

^④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383 页。

^⑤ 陈发长：《灵石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18 页。

^⑥ 张明堂、刘耀武：《平陆县志》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5 页。

新过民困未已精神无所寄托，因而陆牧师传播的教义产生影响，不久 50 余人入教。^①在忻州地区，“最初信教者多系偏僻山村的贫苦群众。他们终年受苦……期望着神灵来解脱他们的人生苦难。传教士宣扬耶稣能叫人解脱苦难……这些说教给人带来幻想和精神安慰，因而得到一些贫民的信仰”。^②

第二类是寻求身后归宿。近代有一些山西民众在传统信仰中没找到所需的终极关怀，没找到灵魂归宿的满意答案。基督教死后升入天堂的教义满足了其要求，他们于是抛弃传统信仰加入基督教。例如：平阳府秀才席子直（席胜魔），从小就考虑人的生死问题。他曾博览儒、佛、道教的经典，但“孔夫子的教训虽好，可是止不住灵魂的饥渴，照不亮坟墓的黑暗”，“佛教使他感到一切是空，道教更使他深受其害”。他曾服食丹药，以求得道长生，以致久病不愈，而在阅读了《新约圣经》后，他认为“《新约》不单是一本书，而是神的启示，启示他素来渴望知道的事情”。^③新教许诺了其灵魂的满意归宿，他因此转变成为虔诚的教徒，尽责的牧师。

口外二十家子柴崇堂，多年欲知身后事，遍方僧人，惑终不解。偶遇天主教司事与之谈，撤觉恍然，遂入教。^④

第三类是因感觉基督教新奇有趣，从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例如：1879 年大宁县北桑峨村民张治本路过临汾，见有人在街头放赈传教，也领了一本《马可福音》而回。当时渠万镡正在该村教书，出于好奇便找张借阅，渠读后觉得有趣，托人从临汾又捎回一本《新约全书》。他读后深受影响，遂去临汾入了基督教。^⑤1881 年荣河县裴庄村民刘光明听说外国人在河津传播新教，觉得新鲜，遂去河津传教处悉心听讲，前后 15 天，受洗成为教徒。^⑥

第四类是价值求索。这部分人经过思索比较，认为基督教是好教门，对它所包含的道德价值产生仰慕，对其教义有了弃假归真般的信仰，为求真道而入了教。例如：1873 年孝义县东头村人郭起茂即说他入教的原因之一为：“缘小的闻听说天主教最善”。^⑦1900 年繁寺县教徒高连登被义和团逮捕。团民审问他因何入教，他答曰：“因为它好”。^⑧在义和团运动中，不少教徒确信自己“所信奉者乃天道，所尊敬者乃真神”，宁死也不出教，表明其信仰包含了价值判断。

这四类人改变传统信仰而入基督教的事实表明，明末以来，特别是进入近代后，山西的传统信仰开始衰落，不能满足一些人的精神需求。外国势力的侵入，社会的变化又搅动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冲击了人们的固有观念。这些对传统信仰产生怀疑的人，开始寻求新

^① 靳子余：《耶稣教在隰县的活动》，《史料辑丛》第 3 辑 1983 年版，第 75 页。

^② 范堆相：《忻州地区宗教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 页。

^③ 戴存义著、刘翼凌译：《席胜魔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 1993 年版第 21，24，60 页。

^④ 《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23 年版，第 306 页。

^⑤ 冯岩：《大宁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9 页。

^⑥ 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2002 年版，第 113 辑，第 568 页。

^⑦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教务教案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974~1981 年发行，第 3 辑第 476 页。

^⑧ 爱德华兹著、李喜所等译：《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4 页。

的精神寄托，基督教正好适合了这些人的需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崇拜，进入 20 世纪后，清朝的灭亡及以后连年的战争，又使传统信仰遭受打击，基督教有了更大吸引力、影响力。这是基督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精神原因。

传教士的第二种传教方式是以物质利益诱人，一些人贪图此利而入教。

教会所给予的物质利益，首先是土地，这点主要见于口外。教会在口外拥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是传教士用低价租、购等手段得来的。教会把这些土地租给汉族移民，但以必须入教为前提。近代有许多口内汉人出走口外，为了得到土地纷纷入教。近代山西口外有大量教民，此即重要原因之一。这一事实反映了山西内地人多地少生计维艰的社会问题。清中叶以后，山西人口迅速增加，到 1877 年达到 16433000 人。人口大量增长造成了人均耕地减少，人地矛盾激化。据统计，同、光之际山西人均耕地为三亩二分余。^①在当时，人均耕地四亩才能维持生存。因此内地人民尤其是晋北、长城沿线的人民纷纷到口外谋生。他们到口外后人地生疏，得不到土地，“既无衣食，那得耕牛”。而口外传教士使用过各种传教方法之后，“觉知使贫民有田可种，乃为最有效而彻底之良好方法”。^②于是大量租购土地，安置移民，令其入教，可见人地矛盾激化，民众生计维艰是基督教在山西立足发展的又一个社会根源。

其次，教会给一些人钱物接济，诱人入教，例如：1894 年瑞典牧师贺赖德到浑源传教，首批发展了城内周礼等人为教徒。后来教务不发展，门庭冷落，他不惜巨资为周礼购置了一套漂亮的院落，不仅使周礼一家感激倍至，而且还引诱得许多教外群众纷纷入教。^③1934 年，由于社会动乱，连年遭灾，山西人民生计维艰。天主教宣传“凡入教者，圣教会给红高粱吃”。人们为糊口度日而大批入教，五台县天主教徒猛增至 17680 人。^④

山西民众为什么会因贪图物质利益而入教？原因是明代以来山西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传统农业文明开始衰落，社会养育功能严重不足，在人均耕地减少，人地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近代又有大片土地改种罂粟，造成了有限耕地的浪费，粮食已不能自足。进入 20 世纪后，频繁的灾荒，连年战乱使物质生产陷入困境，人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解决不了起码的温饱问题。教会以此为突破口，通过向人们提供传统信仰中得不到的物质帮助来吸引他们，进而从精神上影响他们，使之成为教徒，这是基督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物质原因。

传教士的第三种传教方式是通过教育布道，教会所办学校免费招生，有的甚至提供学习用品或伙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

天主教在传入忻州初期就创办了学校。不信教的儿童也可入学，但是学生家长必须来念经，至少不能阻止其子女学习教会经言。不少家长了为让孩子上学，纷纷入教。^⑤1914 年基督教在辽州建起育贤两级小学，传教士用支垫学费的办法，组织发展了一批家庭贫困

^①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 页。

^②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内蒙古大学藏，第 7 页。

^③熊存福：《浑源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39 页。

^④赵培成：《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00 页。

^⑤范堆相：《忻州地区宗教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3 页。

但想上学的青少年加入教会。^①

近代山西义务教育机构很少，大多数群众经济条件极差，生活尚无保障，何谈花钱去读书上学。因此传教士把教育作为其有效的传教手段之一，既吸引教外人入教，又为教会培养了后备人才。近代山西社会教育功能的欠缺是基督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又一社会根源。

传教士的第四种传教方式是通过行医布道。一些人因治病或感西医神效而入教。

新教公理会的文阿德牧师 1889 年来到汾阳，在建起教堂的同时开办了西医诊所，免费给人看病，医好了许多患者，他的善举和医术使人深受感动。武光裕、任子英就是因为文阿德医好病而入教成为汾阳首批教徒的。^②太谷公理会的传教士也办了西医诊所。1889 年，孔祥熙得了腮腺炎，中医医治无效。其父孔繁慈顶着家人的非议，领着孔祥熙来到该诊所就诊。经过高雅格等大夫的精心治疗，孔祥熙痊愈。孔家父子二人感激不尽，高雅格趁机传播教义，二人随后入教。^③

这类事例在山西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可见疾病流行，医疗救治功能低下是基督教能在近代山西立足发展的又一社会根源。

传教士的第五种传教方式是通过赈灾布道一些灾民为度荒活命而入教。

近代山西灾荒不断，每次灾荒都造成一批嗷嗷待哺的饥民。为了度荒活命，他们可以无所不为，包括加入基督教。教会认识到“赈灾是理想的传教手段”，因而赈灾布道之事在山西屡见不鲜。

如前所述，新教是借 19 世纪 70 年代早荒之机而传入山西的，其第一批信徒就是灾民，这种情形在天主教中也有，并在此后的灾荒中不断重演。例如：在 1877 年的特大旱灾中，一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由汾阳到孝义县马庄营村一带施粥济贫，从而发展了首批教徒。^④“光绪十八年，口外空前之灾荒，教堂以赈粮延诱人民入教。于是因救济而奉天主教者均纷纷然趋之如鹜”。^⑤1900 年汾阳遭旱灾，公理会赈济灾民，吸收了一大批生活无依无靠者为教徒。^⑥1929 年平陆遭重大旱灾，新教教会发放赈款救灾，不少灾民取得救济补助，而对该教乐于接受。^⑦大量事实表明，近代山西灾荒频繁，社会救灾功能不足，这是基督教立足发展的又一社会根源。

教会的第六种传教方式是开办戒烟所，通过为烟民戒除毒瘾而传教。许多深受烟毒之害的人为了戒烟或在戒除毒瘾之后感激教会而入教。

1881 年，新教传教士瑞典人山如仁到荣河县裴庄与教徒见面，说他要到陕西韩城传教

^① 赵世元：《左权县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1 页。

^② 刘锡仁、王希良：《汾阳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98-899 页。

^③ 赵荣达：《孔祥熙评述》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28 页。

^④ 倪力人：《孝义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0 页。

^⑤ 傅增湘：《绥远通志稿》内蒙古图书馆藏，卷 81。

^⑥ 刘锡仁、王希良：《汾阳县志》海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00 页。

^⑦ 张明堂、刘耀武：《平陆县志》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5 页。

并要举办戒烟所。当时裴庄有几个人意欲戒烟，于是先报名信了教。1883年东苏冯许海儿、西苏冯张天赐都去韩城戒了烟信了教。1903年，山如仁在裴庄开办戒烟局，附近村庄来此戒烟者络绎不绝，东苏冯的孙履道、刘家堡的刘满囤、张李庄的贾某都戒了烟瘾，信了教。^①平阳府的席胜魔1879年入新教后在外国传教士帮助下戒了烟瘾。1884年，他与教徒范洪年在洪洞开办“天召局”，同英籍牧师林惠生一起戒烟布道，发展教徒。随后席胜魔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设分局，约到1895年左右，在各地天召局戒了烟“信了道的有几百，其中还有当了牧师，做了长老、执事的”。

近代山西吸毒者众多，教会利用深受烟毒之害的烟民急于摆脱痛苦的心理，为他们免费戒毒，同时传播基督教义，把烟瘾的解除归结为基督的神迹，宣扬“人所做不到的，药物不能奏效的，圣灵却能做到”。^②不少烟民因此入教。可见，毒品问题是基督教能在近代山西立足发展的又一社会根源。

除了以上原因外，山西民众还有如下的入教动机。

清末、民国时期，统治者的经济剥削残酷，政治压迫深重。一些人或者为了少出一些摊派，减轻点经济负担，或者为了获得政治保护免受官府惩罚而入教。

1861年清廷下令：“迎神演戏赛会烧香等事与伊等（教徒）无涉，永远不得摊派。”^③加入基督教可以不出数目较大的迎神赛社钱，有时还能不交官府某些“无益之费”，这对于经济负担很重的民众很有吸引力。河曲人贺选，自小与寡母住在姐夫王玉家。成年后与王玉共摊供神钱。1871年贺选应交神社钱三千二百文而未交。1872年贺选入教，王玉再次要钱，贺选遂以已入教不供神而拒绝。^④在神池，凡入教者不纳捐税，家境贫困者可得周济，故入教者逐年增加。^⑤

同时一些传教士利用其特殊身份干预词讼，袒护教徒，一些人需要此种庇护固而入教。例如：1873年孝义县染家坞人尹添亿偷了李广礼家中一面铜锣卖掉，次年被查出，教徒尹怀智言入教可保无事，尹添亿就入了教。^⑥口外王松图路乔印斗，初为密教首，1889年入天主教，又劝约300名密秘宗教信徒入了天主教。^⑦

日军侵华期间，疯狂杀掠华人。外国传教士利用其特殊身份，为群众提供保护、住宿、膳食，许多群众为了活命纷纷加入基督教，因而一些地方此期的教徒人数猛增。例如：1938年~1941年间，日军侵占五台县，到处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沟南天主堂神甫郎文楠在屋顶挂起意大利国旗，让神职人员呼喊全村人避入教堂。并宣传只要加入天主教，日军就不施逆行凶，远近闻之，此间有8060人入教。^⑧繁寺天主教的鼎盛时期在1937年县城沦陷之后。当时的神甫麻一理与日军头目关系密切，人们为获得教堂的庇护，纷纷入教，以致教徒人

^① 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版，第113辑第568页。

^② 《席胜魔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3年版，第219、30页。

^③ 《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690页。

^④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412~413页。

^⑤ 李保和：《神池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8页。

^⑥ 《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485页。

^⑦ 《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版，第306页。

^⑧ 赵培成：《五台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600页。

数超过 1919 年的数倍。^①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临晋、寿阳、广灵、阳高等地，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这些地方的英美教会开始遭日军袭击，教徒人数随之减少。

总之，明末尤其是近代以来，山西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及其导致的诸多问题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官方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又起了一定的驱民入教的作用，所以基督教能在近代山西立足并发展起来。

二、基督教传播与山西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早期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一词，泛指中世纪结束以来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而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兴起的区别于中世纪的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通常被称为“现代性”。“现代化”含有以上两层涵义，但多指后一层涵义。^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过程，这一转变涉及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生活功能诸多方面。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是指晚清和民国时期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与发展，它包括以下要素和特征：在社会结构上，传统结构发生分化，出现具备现代特征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上，由于新技术、新作物品种的引进，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活随之发生变迁，出现新内容和新方式；新信仰、新娱乐方式等的引进，又使精神生活趋向多样化，丰富化。在社会功能方面，教育、卫生、灾荒救治等项功能均有发展，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

基督教的传播对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下先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两方面加以论述。

（一）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

基督教在山西的传播，造就了一群信仰与传统不同的民众。这些人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从而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方式诸方面也有多处偏离了传统，他们组成了与非教徒不同的异质群体。因此，山西民众分化成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两类，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层组织—村社组织中出现了民教分野与冲突。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③是向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标志。

基督教徒与普通民众有以下差别：

第一，宗教信仰不同。

山西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是儒、释、道三教兼信。这是因为，儒之“理”、“佛”之法、“道”之道有一致的精神和共同的追求；儒、佛、道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互相渗透吸收，最终形成了以儒为轴心的合流。因此，传统的山西民众在孔子寿诞之期要去参拜孔子，在佛诞节要瞻仰释加牟尼，在吕祖爷寿诞又要登道观祭扫。除此外，山西民众还信奉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及其他杂鬼百神崇拜的大众宗教。在他们看来，各行有各行的神，各地有各地的仙，神仙的世界如同人的世界一样，既有职业之别，又有等级之分。

^①李斌：《繁寺县志》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6 页。

^②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21 页。

^③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64 页。

为了不冒犯任何一神，他们神神都拜，并为之建庙塑像，在其寿诞举行庙会，隆重祭祀。与此相反，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人间的唯一真神，其他神都是邪神、假神；该教还反对偶像崇拜。这样，基督教徒自入教那天起，便不再尊崇传统宗教及民间诸神，只信仰耶稣基督一神。

第二，伦理道德中亦有不同。

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尊敬祖先、孝顺父母、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教徒则“将本人祖宗父母神牌全行毁弃，以示归教之诚，专期敬于天主耶稣”，从此之后再不行祖先祀典。基督教还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徒的宗教活动是男女老少集体进行。“礼拜之日，少长毕集，男女无别”^①传教士利用各种机会宣扬男女平等，“如各堂口，若设立男子小学，也必设立女子小学；散发赈济，既不偏于男，又不偏于女。时与教友阐明男女关系之正义，相遇之态度”。^②这些对基督教徒势必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偏离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

第三，风俗习惯有许多不同。

基督教与传统信仰、道德的上述不同，势必造成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以伦理道德为指导的风俗习惯的差异。首先基督教徒与非教徒有不同的节日。基督教徒不过传统的清明节、寒衣节及传统信仰中各路神灵的寿诞节。他们每逢周日要做弥撒、祷告；一年之中要过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基督教的节日。其次，基督教徒与非教徒的婚俗不同。传统婚姻是经“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确定的，婚配最讲究门当户对，许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从论婚到结婚要经过问名、纳吉、纳彩、纳征、请期、亲迎等繁琐程序和礼仪。而基督教反对童婚，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1867年南怀仁发表声明，提倡婚姻自由，革除童年订婚的习尚。^③教徒结婚也不再采用传统礼仪，而用基督教婚礼仪式：新婚夫妇身穿礼服，去教堂由牧师、神甫主持完婚。再次，葬礼习俗也有不同。传统葬俗是用棺木装敛死者，请僧、做道场，超度亡魂，经过一系列礼仪后入土埋葬。而基督教徒去世后，是请牧师或神甫抹圣油、做祷告或弥撒，最后用白布裹尸焚化。如太谷教士刘凤池之母死后，其弟问如何葬母，他答曰：“裹尸焚烧我任之”，否则，“听弟葬之。”^④

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差异，加上自1861年后教徒不再出庙捐戏钱，民教冲突之案在山西屡有发生。教徒被视为另类，称作教民。正如时人所言：“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而无教民之称。今者教民纷纷错杂于四民之中”。^⑤“人民先分门户，而教民亦遂自分门户，先为冰炭，继为仇讎”。^⑥而且教徒还建立了独立于宗族、村社组织之外，有些并超越了村界的团体—教会。随着教徒非教徒各分门户及教会组织的建立，村社团结受到破坏，传统社会结构出现裂痕，分化为民教两方。而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正是山西社会早期现代化变迁的第一步。

^① 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第37页。

^② 王守礼：《边疆公教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年版，第15页。

^③ 王守礼：《边疆公教事业》北京上智编译馆1950年版，第39页。

^④ 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⑤ 同上，第34页。

^⑥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57页。

教徒群体的异质性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现代性，如男女平等，正常交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死后火化等等。这表明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意识和行为方式。而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即“使传统社会的人群变成具有现代意识和观念的人群”。^①从此意义上来说，教徒群体的形成是山西社会结构早期现代化的开端。

（二）社会生活变迁

外国传教士在山西传播基督教的同时，把西方近代的一些新技术、新观念、新事物及新的生活方式带入山西，使部分山西民众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内容及方式发生了现代化变迁。

清末及民国年间，外国传教士引进了新技术、新工具，改良了农作物，推动了山西农林牧业生产的改良，从而引起了物质生活的变迁。

美国欧柏林大学毕业的农业专家穆懿尔 1928 年作为公理会传教士到太谷教会学校铭贤学校担任农科主任，直到 1941 年被日军驱逐为止。在此期间，他骑自行车跑遍全省，考察各地农情。为了更多地了解山西土壤，他还在冬季骑着毛驴穿越群山进行考察。他在太谷建立了一个农业实验站，从农民的田地中选种，获得了高产的小麦，小米和高粱。^②为了提高玉米产量，他从美国引进了“金皇后”品种。这种玉米棒大籽多，产量高，有很强的适应性，不仅在山西而且在华北大部分地区被广泛种植。20 世纪 30 年代，铭贤又从外国引进了软布来细毛羊，来杭鸡、甜菜等。软布来细毛羊的羊毛细而长，毛色好；来杭鸡所产的鸡蛋特别大，直至解放后，太谷地区一直有人饲养。甜菜的引入弥补了太谷制糖业的不足。铭贤学校培育出的小麦“169”优种，经山西省政府批准在全省推广，^③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仍在种植。山西栽植苹果，最早也是从铭贤学校南山果园开始的。穆懿尔还改良了苹果品种。^④

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笔者曾去太谷采访当地年龄最大（82 岁），最有声誉的基督教徒张忠。他于 1937 年加入公理会，曾就读铭贤，了解铭贤学校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也了解外国传教士在太谷的工作、生活情况。他所提供的口述史料与文献记载相符。

据张忠讲，穆懿尔还发明了给高粱穗戴纸套子的技术。给受过花粉的高粱穗戴上纸套子，以防花粉被吹落，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产量。

铭贤农科在 1937 年前发明了一边倒的“双铧犁”。这种犁耕地较深，是当时较为先进的农耕工具。公理会传教士还从外国带来了手摇玉米脱料机，提高了劳动效率。

十九世纪末，欧美传教士曾将少量奶牛带入山西。^⑤据张忠回忆，太谷公理会的韩明卫大夫为解决外国传教士的喝牛奶问题，从美国引进了一头荷兰牛。韩明卫死后，将荷兰牛送给一个名叫赵良卿的基督徒。赵良卿在太谷杨家庄开办兴记奶场，又引进一头荷兰公牛，以滋生小牛。现在太谷乡村的奶牛，大多由其发展而来。此外，太谷西红柿也是传教士从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导言第 3 页。

^② 穆懿尔：《穆懿尔老师的中国情结和对美国的希望》，《铭贤儿女通讯》编辑组，第 7 页。

^③ 古盛喜：《山西农业大学校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页。

^④ 穆懿尔：《穆懿尔老师的中国情结和对美国的希望》，《铭贤儿女通讯》编辑组，第 7 页。

^⑤ 郭展翔、王品增、杨王云：《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413 页。

外国引进的。

农林牧业生产的改良，使山西社会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变迁，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出现在物质消费之中。例如，当时太谷出现俗语：“早晨金皇后，中午169，晚上筒发头（指妇女）”，生动地说明了新品种“金皇后”玉米、“169”小麦在群众生活中的地位。西红柿引进后，山西人开始不敢吃，在教会人员的示范下，周围的人也跟着吃、种，最后广泛地推广开来。起初人们会生吃、炒熟吃，但不会瓶装保存，后见外国传教士每年瓶装保存，周围的人照着做，最终也在民众中推广开来。

在服装上，外国传教士的西服对山西教徒的服装转变起了示范作用。在一些教会学校，校方为学生制作校服。例如，铭义中学的男生校服为托尔斯泰式，女生校服为大翻领上衣和短裙，^①张忠回忆说，当时铭贤学生、仁术医院护士的服装与众不同，夏天男生穿衬衣，制服裤，女生穿衬衣，裙子。

在日常器用上，传教士也把当时较为先进的一些东西引进了山西。例如，近代山西民众照明用的是小油灯，外国传教士带来了洋蜡。洋蜡的蜡身粗、芯粗，点燃后要比小油灯亮得多。基督教青年会又引进了电灯、发电机。《山西日报》1919年9月11日第二版报道：基督教青年会从天津购回电灯机一副，刻已安置，楼之内外光照四壁，夜明如昼。

山西民众烫衣服历来用的是一种铁制熨斗。这种熨斗把手与主体相连，底部加热到炙热后，把手部分也很烫手，不利于使用。公理会传教士传入一种新铁制熨斗，把手与主体分离，主体在火上烤到炙热后，再将把手安上，用起来并不烫手。笔者在张忠家见过这种熨斗，上面刻有“Oberlin”字样；据说20世纪30年代在太谷较为常见，约一块大洋一个。

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丰富化是社会现代化的要素和特征之一。如上所述，在这方面，基督教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教士引进了新作物，新品种，促使山西社会的饮食多样化，提高了其质量和营养。基督教徒、教会学校学生的新服装为山西社会的服饰由传统转入现代起了带头作用。新器用引进则带来了方便和科学的信息。上述变迁，使现代化的色彩和特征初步出现于山西社会的物质生活之中。

在精神生活中，基督教也带来一些新事物，使山西民众的娱乐活动发生变化，有了一些现代内容。山西第一家照相馆所用的照相机是传教士带来的。李提摩太花了很多钱购买书籍、仪器。1886年他离开浸礼会时，把一套照相装置送给仆人朱郁文。朱郁文用这套装置在太原开了全省第一家照相馆。^②阳高县的电影机是从外国教堂买来的。^③绥远新教会于光绪13年以灯映片放映于财神庙。^④太原基督教青年会引进了电影机，还购买了发电机，放映电影，开游艺会。《山西日报》1919年9月1日第二版登载：青年会前议购买电灯机器，此项电机业已购到，并由工程师安置妥贴。该会干事特发通柬招致全体会员于本月12日下午在会所开游艺会，即用新机映照电影，以助游兴，洵盛举也……其柬贴中写道：当彼红日西降，（电灯机）聊以助我会员读书、阅读、游艺谈笑之兴趣。今值大功告竣又值天时之便，于本礼拜六日午后五点钟至七点钟特邀军学界竞赛网球、篮球，七点钟到

^①《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07辑，第1121页。

^②《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48辑，第1085页。

^③阳高县文史资料编辑组：《阳高史料总集》阳高政协1987年版，第2辑，第91页。

^④傅增湘：《绥远通志稿》内蒙古图书馆藏，卷81。

八点钟放映电影两片。此后，青年会经常放映电影，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启迪了民智。

基督教会还组织进行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教会学校中的体育器材、场地都很齐全、先进，学生课余进行各类活动。例如，20世纪初，篮球运动传入山西，最初仅在太原、大同等地的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中作为体育活动的普及重点出现。^①太原基督教青年会不仅组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还组织球类、田径项目的比赛。《山西日报》1934年12月10日第五版载曰：太原市青年会举办之乒乓球公开赛，于昨日上午九时在北楼开幕。1934年12月12日第五版又报道：青年会举办之女子乒乓球赛，昨日上午十时在北楼进行了决赛。

基督教会所引入的新式娱乐活动、现代体育活动具有现代精神生活的特征，是现代精神生活内容。这些活动对社会精神生活从传统转入现代起了示范、促进作用。此外，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世俗化是精神生活现代化的内容之一、标志之一。而基督教在山西的传播，就起了导致山西社会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作用。这一点昭然若揭，无需多论。

（三）对吸毒、缠足恶风陋俗的冲击

近代以来，山西吸毒之风猖獗。“吾晋烟丹，岁耗大洋在二千万以上，以致家产散失，妻子不保，种种惨状，吾之痛心”。^②

外国传教士进入山西后，为了获得人民的好感，便利传教而主张禁毒，并早在清末禁烟运动之前就开办了许多戒烟所，为烟民戒毒。这在客观上弥补了官方努力的不足，对吸毒之风起了一定的冲击和遏制作用。

教会对吸毒之风的冲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会不准教徒吸毒、贩毒、种毒品，减少了山西吸毒、贩毒的人数和种植毒品的土地。

从传教开始，教士们就站在反对鸦片的立场上。罗马梵蒂冈传信部应教士们的请求，在19世纪50年代下令：“禁止教徒种植、吸食鸦片，如有违反者，开除教籍”。^③山西主教李路加曾在致各地教友牧人书中说，“切戒洋烟料子等毒品——我以十分恳切的心，劝我的教友，对于洋烟、料子等毒品，该十分躲避，不要沾染这可怕的毛病”。^④如果有教徒吸毒、种植毒品，一般都会会在教士的帮助下戒绝，因此，教区是禁烟的标准地区。例如当时隶属萨拉齐的河套地区，自1875年教士们去传教，到民国14年为止（1914年划出山西）教堂土地从来没有种过烟苗，在教堂村庄，公开吸食鸦片是绝对没有的。^⑤

第二，教会组织拒毒团体，在全社会进行各种禁毒活动。

《山西日报》1917年7月1日第二版登载：太原青年会为使各种毒物早告肃清，为民除害，造福苍生，定于7月12、17、25日在总商会兼请省议会、省教育会、总商会、教育会、邮局、报界协会、正太铁路等团体开筹备会三次，商榷组织山西拒毒会。拒毒会及分会大力宣传毒品之危害，教育、帮助烟民戒毒。

^① 关彬：《山西通志·体育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7页。

^② 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1928年山西村政处校印卷六，第29页。

^③ 《边疆公教事业》第91~92页。

^④ 《边疆公教事业》第92页。

^⑤ 李路加1941年《致全区教友牧人书》，第14~15页。

省青年会与拒毒会为联合各界协力拒毒，不惜重资从上海青年协会租赁拒毒影片，自1924年10月28日起在海子边自省堂放映一周。该片为美国余华娜夫人所制，名为“人间地狱”，能醒人迷梦，大有暮鼓晨钟之势。函请省垣男女各界轮流参观。并请刘君武、李应晨等先生逐幕解释，听者均甚满意。统计七日之内观者约14000余人。^①

省拒毒会干事基督徒苏活泉于1923年3月14日在吉县监狱，为烟丹人犯演讲拒毒。先将犯人排成一列，次将所带拒毒布画悬挂墙壁，然后诚诚恳恳，指图详为讲解。烟犯因良心感动，泪流满面，不一而足。且有烟犯张根五当场宣誓曰：出狱之后，无论如何再不做此不道德之事（指贩运烟丹），并应许奉劝亲友也不作此祸国殃民之事。^②

第三，教会举办了许多戒烟所，为不少山西烟民戒除了毒瘾。

除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荣河之例外，教会还还在太谷、朔县、浑源、大同等许多地方举办了戒烟所。例如：

太谷公理会在各布道所成立了戒烟所。据1915~1925年大略估计，仅敦坊布道所每年戒烟者就有二三百人次。^③朔县教堂的戒烟所，1925~1926年有80多人入所后戒了烟瘾。^④青年会于1933年在大同市成立了戒烟所。前后举办五年，戒烟者共500余人。^⑤

戒毒成绩最佳者为平阳府教士席胜魔。先后在他开办的各地天召局成功戒毒者有男男女女几千人。^⑥

除吸毒外，山西曾是缠足陋俗的重灾区，受缠足之害：“向来较他省为甚”。传教士到达山西后，首先对此陋俗发起攻击，劝令教徒不缠足和放足。1860年西湾子的教士们就曾竭力想把这种陋俗铲除。他们谆谆教导地方上的民众，并且组织宣传队，用已经放了足的妇女作榜样宣传。经过许多宣传，总算实行了天足。嗣后新立教堂的地方，往往以解放缠足为第一要务。经过逐渐推广后，凡是信教者都没有这种恶俗沾染。1867年南怀仁发表声明，响应“天足会”号召，嘱咐教士们努力铲除缠足的陋习。^⑦此后，凡入教的妇女都要放脚，到教会学校上学的女孩也要放脚，教徒的女儿不再缠足。例如，两个名叫傅琼、艾桃的女孩，来太原教会女子学校上学后就放了脚。^⑧在清末民初的不缠足运动中，基督教会又配合政府，劝人放足。例如，胡礼智的部队在祁县宣传剪辫子、放足，祁县的天主教也大力配合，不准留辫子、缠足之人进教堂。^⑨

基督教禁止女教徒，教会学校女学生缠足的规定，开了山西妇女不缠足的先河。女教徒、女学生的放足为其余妇女的放足树立了榜样。而基督教会政府对放足政策的配合，更对山西的不缠足运动起了推进作用。

吸毒、缠足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两大恶疾，它们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是影响社会早期现代化的两大问题。基督教会对其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众健康、合

^① 太原基督教育年会：《山西拒毒会报告书》第17期，1924年版，第25页。

^② 太原基督教育年会：《山西拒毒会报告书》第10期，1923年版，第1页。

^③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1辑，第821页。

^④ 雁北行署民族宗教处：《雁北宗教志》1986年版，第166页。

^⑤ 大同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大同文史资料》第17辑1990年版，第103页。

^⑥ 《席胜魔传》第219页。

^⑦ 《边疆公教事业》第91、39页。

^⑧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28页。

^⑨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412页。

理的新生活方式的建立，减小了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困难和阻力，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山西社会功能的早期现代化

(一) 教育功能的扩大与变迁

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办了许多学校。由于教会学校的办学模式源于西方近代的教育思想，因而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起了示范、促进作用。教会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较的先进性有下列四点：

第一，从教育对象看，传教士认为每个人均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比中国传统教育，即只注重培养少数男性优秀分子入仕更具先进性，更接近近代教育中的国民教育。

第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的封建教育只培养文学与政治人才，是一种单纯的通才教育，教育内容以文字材料为主，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完全忽视专才和职工教育，教育与现实生产完全脱离。教会学校开设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开办专门学院培养翻译、外语、法律、医学和工程技术等专门人才，实现教育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相结合。

第三，就教育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教育偏重道德教育；而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则是近代意义上的全面教育，即一定程度上的德、智、体、美四育。

第四，以教学方法而论，教会学校基本上采用了一套近代教育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注重培养思维能力和采用实验方法。传统中国教育以教师输入为主，讲解和背诵是基本方法，忽视思维训练。^①

教会在山西办的学校，也具备以上四方面的先进性，是山西最早出现的现代教育机构，对山西教育的早期现代化起了示范、推进作用，同时也弥补了社会教育功能的不足。

光绪年间，山西晋报局总办程守清在上山西巡抚遵拟白话报并演说简章的禀贴里说，山西省不识字的人占全省人民的90%。^②而妇女则基本上全是文盲。

晚清的启蒙教育主要由民间学塾承担。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山西全省有私塾1320所，义学400余所。^③到民国时期，政府改办学校。但学塾、学校规模很小，尤其在山区、农村分布较少。加之大多数人民生活贫苦，没能力送子女上学，实际就学儿童寥寥无几。下列两表就说明了这种状。

表1 1918~1935年山西学龄儿童入学情况表

^①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20~221页。

^② 傅葆琛：《我国文盲人数之谜》，《山西民众教育》第3卷第3期1936年版，第58页。

^③ 杨进发、张理明、张忠政：《山西通志·教育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5页。

年度	学龄儿童	入学儿童	入学率%	年度	学龄儿童	入学儿童	入学率%
1918	1202503	460069	38.5	1925	1385780	993009	70.6
1919	1501433	680544	45.3	1929	1277891	835473	65.4
1920	1470979	951486	64.7	1930	1221617	852687	69.8
1921	1432039	857055	59.9	1931			58.0
1922	1523942	1060614	68.3	1933	1306584	866174	66.3
1923		787935		1935	1281344	849629	66.0
1924	1461842	1056115	72.2	1935			58.0

①此表来自《山西通志·教育志》(中华书局, 1999)第35页

表2 1912~1925 全省学务比较表①

年度	每百人中学生人数			年度	每百人中学生人数		
	男	女	计		男	女	计
1925	16.1	2.0	9.6	1918	7.5	0.5	4.5
1924	15.3	3.1	10.0	1917	5.9	0.1	3.4
1923	16.3	3.7	10.7	1916	4.9	0.1	2.9
1922	15.4	3.2	10.0	1915	5.4	0.1	3.1
1921	14.8	1.7	9.0	1914			2.8
1920	14.0	2.0	9.0	1913		-	2.1
1919	14.8	1.7	9.0	1912			1.6

①此表来自《山西省第十次教育统计》第9国14年度(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 民国19年7月刊行)第31页。

传教士来到山西后, 认识到山西教育功能的缺陷, 为了传教, 办了许多学校。

表3 近代天主教在山西开办的学校①

县名	所办学校及时间
平遥	1945年办永福小学
繁寺	1919年境内有天主教会学校5所
代县	1932年创办明原小学校1所
和顺	1935年成立教会学校
晋城	1912年大箕小寨创办教会学校1所, 1930年庚能村创办教会小学1所
武乡	1902年在上司、小店办起经言学校
平定	1902年创办荣真小学, 1935年创办经言学校
朔县	1928年开办圣安多尼小修道院; 1929年办贞女学习班; 1939年正式开办明德高小
浑源	1929年在涧村设初级小学; 1933年创办圣心小学校; 1933年在东辛庄开办1年若瑟小学; 1941年办福源小学1所
广灵	南村教堂设初等小学; 西加斗设男、女初等小学
宁乡	1917年办铭义小学; 城内办有明原小学; 1933年改崇原小学

太原	1912年创办明原小学；1912年创办加辣女校；1917年增建明原中学
洪洞	1914年创办多禄学校
河津	1931年创办教会学校
垣曲	1937年建教会学校2所
大同	榆林设男初等小学校；1927年创办育英小学、西册田天主堂小学；1941年办育英中学
吉县	设博爱小学1所
新绛	1918年设修道院；1944年修女院的女子学校与天主堂男校合并为安道小学
永济	1933年设方济小学
临猗	小张和东来庄都设教会学校
稷山	1940年建教会学校
绛县	1940年后办一个经言班
孝义	1930年开办博爱小学1所
汾阳	1927年办小修道院；1928年办预修道院；1931年成立神哲学院；1933年在城内办经言学校；1933年办攻读小学
五台	1916年创办小学3所；曾在沟南、白家庄、河府开办明原小学
祁县	咸丰年间九及村设教会学校1所；1931年成立“贫寒子弟教学救济会”；1934年左墩村设教会学校
榆社	1884年教堂有校房3间
榆次	1938年有修道院；两级小学名1所；1940年办完光小学
陵川	望远村有2个经言学校，1所普通学校
临县	1932年办私立养正两级小学
潞城	1903年办安多尼学校；1912年增设高小、师范两科
长治	办类思小学
汾城	办育德小学
阳城	有男女小学校；1922年办主日学校
忻县	1919年有教会学校7所，1921年增至10所，1936年有男校11所，女校4所
怀仁	有高小
隰县	民初办男女小学

①本表及下表均由笔者综合近年新修各县县志，《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各县文史资料制成。

表4 近代新教在山西开办的学校

县名	开办学校及时间
榆社	1917年办维贤小学
太谷	1889年办福音小学；1898年在里美庄、南张、县城南关设立小学；1901年后办贝露女校；1907年办铭贤学校；1918年办毓德妇校
昔阳	三个耶稣堂分办三个学校；王寨耶稣堂办平民学校；民初办女修道院女子小学
芮城	1895年后办育德小学；1935年增设女子学校

曲沃	20 世纪 20 年代设妇女学道院；30 年代办企善学校、淑贞女校
大宁	1904 年创办文山小学校
闻喜	教会附设有小学
稷山	1946 年创办光培小学
交城	阳渠办贝露女校；城关办崇实小学后改铭贤小学
孝义	1925 年创办基督徒男子小学和基督徒夏令小学
汾阳	1899 年办铭义小学；1914 年将教会附设太和桥小学、西关小学、小南关小学、冀村小学、城子小学、裴会镇小学合并为铭义小学，后因学生增多，初中部由原校分出另建中学；1909 年办崇德妇校；1917 年增设初中班，改为崇德女学堂；1928 年男女合校，初中部并入铭义中学；1915 年建崇德妇女学校；1926 年二校合并；1915 年办铭义中学，1922 年增设高中部；1913 年建汾阳基督教神道学校
猗氏	1911 年办仁德女校、信德男校，设“快字班”；还办崇真学校、灵育学校
万荣	1903 年办福音小学
运城	办有崇真学校
河津	1901 年设教会学校
灵丘	1901 年设小学 1 所，后来先后办学校 4 所
临汾	1893 年办男女小学各 1 所
长治	开设有男女学校、圣经学习班、扫盲班；曾办鸿恩小学
平定	1915 年开办新民学校、淑贤学校、学道院，后增设晋友中学班
应县	1917 年设小学 1 所
朔县	1915 年设小学 1 所；后设女子小学，聋哑学校
平鲁	1921 年办崇实小学
天镇	办有教会学校
清徐	1921 年在青堆设立铭贤初小；20~30 年代在清源长头、西谷村设贝露小学
介休	1919 年设男女学校各 1 所
原平	浸礼会附设男女学校 2 所
宁武	1941 年宁化教堂设立高等小学校 1 所
静乐	1923 年教堂附设小学 1 所
代县	1891 年开办讲书堂和蒙养小学堂
保德	1933 年成立贫儿工读院
左权	1914 年开办道学院、育贤两级小学
高平	1919 年设主日学校 1 所
晋城	1927 年办小学 1 所，1930 年增设高小班
沁县	1931 年创办学校
山阴	1920 年创办崇实小学、蓄牧学校
永宁	1915 年办铭义小学 1 所
兴县	1917 年办耶稣小学、育贤学校
岚县	办有教会学校

洪洞	1911年办道学院；1904年办普润中学；1918年办洪洞基督教小学；1925办励德女子小学
霍县	1909办崇真女校
永济	办有4所学校
忻县	先后创办崇实高小、庄磨镇学校、妇人学校；1920年自立会开办学堂；1928年大同会附设学校
繁寺	办有崇德学校及济贫小学校
神池	办有教徒学校
太原	1878年创办孤女学校；1891年办教会女子学校；1921年安息日会开办学堂；20年代办崇实中学、崇德女校；青年会办有青年会中学；1932年安息日会办神学院
寿阳	1899年国办教士子弟创办学校；1913年办明德小学
浑源	办有学校
左云	办有学校
汾城	办有博爱小学
永和	办有学校
怀仁	1922年办崇实国民小学
榆次	1940年办三育小学
右玉	办有学校1所
和顺	教会附设有学校
定襄	办有学校1所
屯留	办有学校2所
阳曲	办崇德男学校、尊德女学校
赵城	办有学校1所
阳高	办福音小学校
隰县	1932年设立教会小学
离石	1927年办铭义小学
文水	1927年办铭贤小学
大同	办育贞女校；1938年办明德小学；1919年办崇实高小
河曲	1918年后办一所教会学校

表5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数量表A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榆次	美国	耶稣教	1	119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5	700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1	46	孝义	美国	耶稣教	1	26
文水	法国	天主教	4	329	平遥	英国	内地会	1	14
岚县	挪威	耶稣教	1	21	临县	挪威	耶稣教	5	270
兴县	挪威	耶稣教	1	44	中阳	美国	天主教	4	86
徐沟	美国	神召会	1	73	离石	美国	公理会	1	24
清源	美国	耶稣教	4	217	襄垣	荷兰	天主教	4	160
潞城	荷兰	天主教	1	27	永济	瑞典	福音教	1	54

陵川	美国	耶稣教	1	59	猗氏	瑞典	信义会	1	19
辽县	美国	友爱会	1	35	解县	瑞典	耶稣教	1	41
榆社	美国	耶稣教	1	52	安邑	瑞典	耶稣教	1	93
平定	美国	友爱会	2	110	芮城	瑞典	耶稣教	1	38
昔阳	美国	友爱会	2	70	新绛	荷兰	天主教	1	30
孟县	美国	友爱会	1	56	霍县	美国	耶稣教	3	345
曲沃	荷兰	内地会	2	44	赵城	法国	天主教	9	295
隰县	荷兰	天主教	1	33	左云	瑞典	耶稣教	1	60
大宁	英国	耶稣教	2	42	朔县	意大利	天主教	6	186
山阴	瑞典	耶稣教	1	56	忻县	英国	耶稣教	9	457
阳高	瑞典	内地会	1	53	定襄	英国	耶稣教	1	24
天镇	瑞典	耶稣教	1	62	静乐	挪威	福音教	2	30
广灵	荷兰	天主教	1	24	崞县	英国	耶稣教	4	94
灵邱	瑞典	耶稣教	6	282	繁寺	英国	耶稣教	1	34
合计	100	4934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及学生数量表 B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榆次	美国	耶稣教	1	21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2	66
清源	美国	耶稣教	6	179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7	717
临县	意大利	天主教	2	119	辽县	美国	友爱会	1	34
大同	瑞典	内地会	2	146	忻县	意大利	天主教	2	94
平定	美国	友爱会	2	71	曲沃	荷兰	耶稣教	1	10
寿阳	美国	耶稣教	1	20	永济	瑞典	福音教	1	42
猗氏	瑞典	信义会	1	24	隰县	荷兰	天主教	1	45
右玉	瑞典	耶稣教	1	22	合计			31	1610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C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阳曲	美国	天主教	1	47	潞城	荷兰	天主教	1	25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1	30	辽县	美国	友爱会	1	42
清源	美国	耶稣教	1	21	平定	美国	友爱会	1	24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1	116	寿阳	美国	耶稣教	1	40
临县	挪威	耶稣教	1	84	洪洞	荷兰	天主教	1	78
离石	美国	公理会	1	65	安邑	瑞典	耶稣教	1	66
长治	美国	耶稣教	1	65	忻县	英国	耶稣教	1	22
崞县	英国	耶稣教	1	41	合计			15	770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D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阳曲	意大利	天主教	1	26	辽县	美国	友爱会	1	16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1	22	平定	美国	友爱会	1	13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1	98	霍县	美国	耶稣教	1	30
合计			6	205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E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阳曲	美国	天主教	1	89	寿阳	美国	耶稣教	1	14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2	128	安邑	瑞典	耶稣教	1	95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1	98	合计	6	424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F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太谷	美国	耶稣教	1	28	霍县	美国	耶稣教	1	36
汾阳	美国	公理会	1	51	合计	3	115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G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潞城	荷兰	天主教	1	12	安邑	瑞典	耶稣教	1	92
洪洞	荷兰	天主教	1	33	合计	3	137		

1925年山西教会学校学生数量表 H

县别	国别	教会	校数	学生数
阳曲	意大利	天主教	1	26

此表根据《山西第十次教育统计》民国 14 年度（山西省政府统计处编纂，民国 19 年 7 月刊行）第 206-211 页所列的外人设立学校制成。

教会所办的学校，弥补了山西社会教育功能的不足。例如，塞外在 1880 年前仅有一所公立学校，此外偶然有些地方由几家富户合资设立一间临时性私塾，请一位先生课读他们的子弟。1880 年传教士初到塞外，立即设立学校。他们先倡办几个短期书房，不用缴费，贫富都可上学。第一阶段就成立了 40 个书房。^①根据表 16，到 1925 年山西共有教会学校 165 所，学生 8221 人，其中小学校 152 所，小学生 7519 人；中学 9 所，中学生 539 人。据《山西省第十次教育统计》，同年全省有省立、县立、区立小学校 1407 所，学生 86096 人，私立小学 24104 所，学生 906810 人；省立、县立中学 23 所，学生 4449 人，私立中学 11 所，学生 1706 人。教会小学校与公立小学校的比率是 10.8:100，小学生的比率是 8.73:100；教会小学校占全省小学校的 6%，小学生数总数 7.6%；教会中学与公立中学的比率是 39.13:100；中学生数的比率是 12.12:100；教会中学占全省中学的 26.5%，中学生数占 8.8%。

从《山西省第十次教育统计》可知，当时山西公立学校少，私立学校多。私立学校收费较高。而教会学校收费很低，有的还不收学费，甚至提供膳食、学习用品，这就为贫寒

^①《边疆公教事业》第 96 页。

人家的子女读书就学提供了机会。挪威传教士在兴县开办育贤学校，学生不仅不用出学费、伙食费和烤火费，而且学校还发书籍、学习用品，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入学。^①1917年，教会在宁乡开办学校。由于学费比一般私塾低，贫寒家庭的子弟有十多人上学。^②平定友爱会所办的学校，管吃管住。本县的郭寿、杜鸿成、杜鸿玉、顾宏创因家庭生活无着，遂到该校上学。^③1931年祁县教会成立“贫寒子弟教学救济会”，家境特困者全部免费，收50名学生入学。^④正如新教人士所言，教会办学“从任何意义上说，不是为了反对而是要补充中国的教育。”^⑤事实上，教会办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弥补山西社会教育功能不足的作用。

同时，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师资、设备等方面具有现代教育的特征，对山西教育的现代化起了示范、促进作用。

在教学内容上，教会小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体育、常识、音乐等，中学课程有英文、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美术、音乐等。其中英文教师几乎全是外教，水平较高。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与现代学校的教学内容相仿。

在教学方式上，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已抛弃以让学生死记硬背为主的模式，而采用西方的现代教学模式，强调理解，注意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

在师资、设备上，教会学校经费充足，往往用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优秀教师任教。许多教会学校如普润、铭义、铭贤、平定新民学校等都有图书馆、科学实验室，购买、配置了大量图书、物理与化学仪器及生物标本、仪器，而且具备各类体育器材、各种活动场地，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方式及师资、设备是山西早期现代学校的楷模。为山西教育的早期现代化提供了样板和借鉴。

此外，教会在山西许多地方举办冬季学堂或夜校，帮助成人文盲粗识文字、算术，为山西社会的扫盲做了一定工作。例如：

在口外，有教会的数名教员到临近的小村落轮流教育村民，使他们粗识文字。^⑥不少教堂还设立了“青年识字夜校”，特为救济失学的青年，让他们学习书写、识字、珠算等。

太原基督教青年会的薛觉民、梁艺府在杏花岭一带施教，使数百名黄包车夫能识字、写信和算帐。^⑦

太谷公理会在太谷一些农村办过春冬季节性的平民学校，教成人文盲认字、写算。^⑧

昔阳王寨耶稣堂在郝家坪办平民夜校，分初、高级两个班，招收本村农民上学，白天劳动，晚上念书。^⑨

另有平定、阳高等地的教会也以各种形式教农民识字、算术。教会的扫盲工作，对山西社会教育功能不足所导致的文盲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缓解作用。

还应指出的是，教会开办的各类专门学校为山西培养了专业人才。例如，教会在山西

^① 岚县文史资料研究会：《岚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版，第101页。

^② 阴乃二：《中阳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页。

^③ 平定县统战部史志编写组：《平定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版，第127页。

^④ 武殿奇：《祁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69页。

^⑤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184页。

^⑥ 《边疆公教事业》第39页。

^⑦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113辑，第566页。

^⑧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1辑，第822页。

^⑨ 史文寿：《昔阳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73页。

开办的男女师范学校，为山西的教育培养了现代师资和管理人才。教会开办的职工学校培育出一批新型技术人员。山阴县开办的畜牧学校，由擅长养牛的瑞典牧师示范、讲解饲养知识，学生一边从事饲养劳动，一边学习养牛常识，^①成为晋北畜牧业最早的技术人员。

1901年李提摩太草拟《办理山西教案章程》，提出用“培款”创办中西大学堂的主张。1902年设立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负责西学专斋，敦崇礼、苏慧廉等传教士曾任教习。西斋仿英国学制，初设预科，后逐渐设置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5个专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现代专业人才。教会学校及山西大学堂西斋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为山西经济、文化的早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这对山西社会养育等项功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有利的。

（二）医疗卫生功能的发展与变迁

传统医疗救治功能是由分散的个体中医承担的。现代医疗救治功能除中医、中药的作用外，主要特征是西药、西医技术的运用和组织化的医疗机构——医院的建立。两者相比，传统医疗功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卫生功能更是传统功能中的短缺项目。

在近代山西劳损、风湿等常见病、多发病无处不在，霍乱、伤寒、天花、白喉、鼠疫等传染病、疑难病时常流行；社会医疗卫生事业落后，防病、治病功能低下。有些病传统医药无法根治。对传染病则缺乏具体的预防、控制措施。1939年一位记者在垣曲考察，见每家均有一、二人身患疟疾。患者十有八、九不加治疗，听其蔓延、溃烂。“至于其他急性传染病如伤寒、回归热等，患者更为普遍。记者寄居城垣与皋落一带较久，所到各村，无一不有此种病症患者，其中以皋落村附近为甚。患者家数人数，因不能加以统计，概言之，每十家总有一、二人以上。”^②此种情况在近代山西的许多地方都可见到。

社会医疗技术差及民众贫穷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思想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则是促成这种状况的主观因素。近代大多数山西人患病后不是去请医生治疗，而是求神拜佛，请巫婆、神汉做法。例如：为了避免瘟疫，山西许多村落每年春季都要打平安、送瘟神。患了天花，要向“痘神爷”许愿，消灾免难。在雁北，每遇有精神失调患者，就加以“狐仙”“妖鬼”附身之名，请来巫婆、神汉为其捉鬼驱妖，有的人并进庙拜神，烧香还愿。^③1922年，孟县流行腥红热。忍饥挨饿的家庭中病人发高烧、发疹、喉痛，呼吸困难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死者不计其数。此时求神、讨药者到处可见，城内南街吕祖庙内，求药的人如流似水，终日不断。^④

目睹如此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外国传教士为了广传基督教，在山西开办了不少诊所、医院，为山西教徒、民众治病。根据近年新修的各县县志、《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及各县文史资料，教会在近代山西共办大小医院、诊所40多个，表6、7说明了天主教、新教开办诊所、医院的情况。

表6 近代天主教会在山西所办的诊所、医院

县名	所办诊所、医院及时间
----	------------

^① 《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509页。

^② 方新：《贫劳疾病交困下之民众》，《西线》第7期，1939年出版，第26页。

^③ 《雁北宗教志》，第155页。

^④ 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孟县文史资料》第1辑，孟县政协1986年出版，第147页。

运城	1900年后设天主医院；1923年开办天主诊所
潞城	设施医处
屯留	1923年开办医疗院
新绛	1918年设医院；1932年办绛州首善堂医院
榆次	1938年有诊疗所；1949年创办教区诊疗所
朔县	1929年在米昔马庄办小型诊所；1937年在城内开办一门诊部
大同	有教会诊所；1947年开办天主教诊所；榆林村教堂有诊所
太原	1902年办若瑟医院
长治	1922年办仁慈医院
介休	1949年办骨科诊所
阳高	张官人屯有诊所
天镇	莫堡、马家皂有诊所，城内也有
浑源	东辛庄、城 内都有诊所

表 7 近代新教会在山西所办的诊所、医院^①

县名	所办诊所、医院及时间
太谷	1883年在里美庄开办西医诊所；1889年在城内办诊所；1904年办仁术医院
昔阳	王寨耶稣堂办一个诊疗所
闻喜	教会附设有诊疗所
汾西	1934年办同仁医院
汾阳	1889年办诊所，后扩建为宏济医院，又改名为汾阳医院
荣河	1930年开设福音医院
翼城	1908年设南华医院、博爱医院
灵丘	1945年办医院1所
临汾	1893办教会医院；1901年后建威尔逊医院；1912年建善胜医院；1920年新建女医院；1945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设诊所
长治	1901年后办教会男女医院；1926年办鸿恩医院
平定	1915年办友爱医院
清徐	1921年设仁术支医院
代县	1891年后建医院1所
保德	设红十字医院
辽县	1921年开办友爱医院
沁县	1930年办民友医院
兴县	1940年前教会开办医院
岚县	办有西医诊所
忻县	1912年办诊疗所
神池	设小型诊疗所

太原	1880年办斯科菲尔德医院；1903年修复，改建为耶稣男女医院，后改名博爱医院
霍州	设有教会女医院
大同	1917年圣公会办首善医院，后改名为晋北医院
新绛	1921年办大同医院，后又办宗华医院
永济	办过同仁医院、工学医院
高平	1915年办圣保罗医院，后办百川医院、武周医院
晋城	1928年办博爱医院
离石	1917年办广治医院；1930年改名为化南医院
河由	1918年办一个教会诊所

①据《运城地区宗教志》（运城地委统战部、运城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处合编，1987年刊行）第30页，运城、平陆、闻喜、新绛、永济等市县共举办八所教会医院、诊所。本表及上表所列与此数略有出入。

第一，教会开办的诊所、医院，低价甚至免费给贫苦患者看病，解除了许多患者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医少药的状况，弥补了山西社会医疗救治功能的不足。例如：

在口外，三盛公由教士诊病，每年约有一万名就诊的病人，修女也常应邀出诊。归化、包头是由传教士在堂内设立诊所，平均每日就诊病人为50~60名。归绥、固阳县的教士，每天都要费半天的时间，诊疗许多来自60公里以外地区的病人。玫瑰营、香火地这两处的门诊也很发达，平均每年有8000~165000名的就诊者。西湾子于1899年设立诊所，教士时常出诊，免费治疗，平均每日有50~60人。^①

在晋北地区，大同的天主堂诊疗所只收挂号费不收诊断费、药费，每日就诊患者不下300余人。该所尤以外科、眼科驰名各县。^②广灵县教士为体恤穷苦病人起见，特制了几种普通又有效力的药剂，施赠居民。^③朔县城内的天主教门诊所有医术高明的石尼德神甫，一人就治疗好70名患者。^④

据1921~1930年不完全统计，晋中太谷的仁术医院就诊人数约为65813人，住院人数5254人，大小手术2662起。^⑤

汾阳医院1924年每日门诊病人50人左右，常有住院患者60余人。^⑥

运城福音医院，每年门诊约四万人次，住院千余人次，而且免费为贫困患者治疗。^⑦

第二，教会医院为近代山西控制各种疫病做出了贡献，也对各种流行病、传染病的预防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教会人员向社会广泛宣传医疗卫生常识，对改良社会卫生、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病、治病意识和能力做了一定的贡献，使山西社会初步有了现代卫生防疫功能。

教会医疗人员曾多次参与山西地区的疫病救治工作，并且多次扑灭了疫病。例如：

①《边疆公教事业》，第88~89页。

②《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392页。

③《边疆公教事业》，第9页。

④《雁北宗教志》，第131页。

⑤《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7辑，第922页。

⑥《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第497页。

⑦运城文史资料研究会：《运城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版，第93~95页。

1901年至民国初年，晋北数次发生黑死病和鼠疫。太谷仁术医院院长韩明卫，带领医护人员赶赴疫区，参与救治、防治。太谷教区总干事康保罗还带领医疗慰问团到疫区视察。

①

1918年1月，肺疫自口外传入晋北7县。北疫潜伏期短，发病快，患者一周左右即死。据《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载：从1月14日至28日，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大夫如英国的叶卓志、司徒礼克、裴莱司、恩德顺、傅约翰和美国的王普乐、韩明卫、范纳满、法顺兰等皆赴疫区考查、防疫。汾阳医院的万德生大夫带领多人去临县救治病人。《山西日报》1919年8月1日第二版登载：昨日省长布告云：案准铨叙局咨开前呈请奖办理临县防疫出力人员万德生等勋章一案，于本年6月25日奉大总统指令均准如拟给章，案内万德生一员奉准奖给五等嘉禾章，胡宗处，陈鼎亨均准给六等嘉禾章……准给奖各等嘉禾章者计194人。

1920年平定一带还流行转筋霍乱、白喉、鼠疫，友爱医院及时给予治疗，抢救了一些人。^②

1931年晋西临县、兴县一带和陕北榆林、绥德等地区先后几次发生鼠疫，阎锡山电邀汾阳医院前往扑灭。南京中央政府批准万德生为山陕防疫总督。实际上这是汾阳医院第5次扑灭鼠疫了。当时万德生带领中国医护人员组成的防疫队伍，跋山涉水，往返于疫区各地。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彻底扑灭了陕北、晋西的鼠疫。^③

在预防各种传染病、流行病方面，传教士及教会医院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

在口外，每年天花发作的时期，教士们总要竭力推行预防天花的种痘工作，使种痘的事情，普及到最偏僻的乡村。^④

太谷仁术医院每年定期派人到乡村施种牛痘，注射伤寒、白喉等病的预防针。据统计，1935年该院为民众接种牛痘2372人，1937年接种牛痘8300人。^⑤

教会还宣传医药卫生常识，努力改良公共卫生。在口外，乡间教士们常教给农民一些卫生常识，譬如小儿科及流行病的预防法。^⑥在晋中，太谷公理会的仁术医院曾专门设置过卫生游行干事，向农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并在一些城镇提倡和推广饮水改良和厕所改良工作。^⑦平定友爱会在平定教区派出宣传人员，深入街巷集镇，以幻灯、小电影等形式，宣传卫生医药常识。^⑧

第三，传教士在行医过程中，把西医、西药及现代医疗科学与技术传入山西，打开了山西现代医疗业的源头。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教会医疗机构在山西的创办发展，西医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儿科、口腔、放射、检验、病理等学科相继在晋建立，西医西药逐渐被国人接受。例如：

1880~1883年，太原博爱医院开始进行白内障手术；1902年太原若瑟医院设眼科；1932

① 张子荣：《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三晋文化论丛》第3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② 张子荣：《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239页。

③ 中共汾阳县统战部、汾阳县民族宗教科：《汾阳县民族宗教志》1985，第51页。

④ 《边疆公教事业》第91页。

⑤ 赵震寰：《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9页。

⑥ 《边疆公教事业》第91页。

⑦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7辑，第922页。

⑧ 张子荣：《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238页。

年潞安仁慈医院设眼科。^①

1890年汾阳医院开始痈肿、疖子、体表小瘤、包皮等外科治疗；1902年太原若瑟医院设外科；1910年汾阳医院设手术室，至1924年已能进行阑尾切除、疝气修补、截肢、骨结核等外科手术。当时开展外科手术诊疗的还有太谷仁术医院、太原博爱医院、潞安仁慈医院等。^②

1902年太原若瑟医院设妇产科，开始用新法接生。1921年汾阳医院设产房，1924年开展剖腹产手术。这期间太原博爱医院、太谷仁术医院、大同首善医院、平定友爱医院相继开设妇产科。1936年汾阳医院开展卵巢囊肿切除手术。

1924年汾阳医院设牙科，1942年大同晋北医院设牙科。

1920年汾阳医院万德生，太谷仁术医院韩明卫分别从美国购回50MAX光机，开始把透视用于疾病诊断；1936年太谷仁术医院的俞伴梅还开展各种透影检查。^③

至于西医内科，各教会诊所、医院一般都有，这里不再举述。

第四，教会所办的一些大型医院设备先进，科室齐全，医术精良，奠定了山西现代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并对山西人办这种机构起了示范、推动作用。例如：

平定友爱医院是一所大型的现代化医院。该医院设备、人才全部来自美国，医疗水平驰誉省内外，尤以手术见长。1949年平定县政府接管该医院，改名为平定县人民医院。

太谷仁术医院于1923年扩建成功，前后五排病室的院舍基本落成。北楼设有候诊室、门诊室、药房和男护士宿舍。南楼系产科楼，专收产妇及其他女病人。中间各楼为男病人和儿童患者的病房。该院设备先进，是山西最早有X光机的医院之一，能做透视及各种造影检查；并有手术室，能做阑尾切除、疝气修补、剖腹产等手术。1949年后山西省卫生厅接管该院，改名为太谷县人民医院。

汾阳宏济医院于1921年扩建完成。该院是正面4层，两侧3层的“八”字楼，设有男女病房、男女门诊、候诊室、手术室、X光室、化验室、图书室及行政办公室。该院还在峪道河王盛庄附近设有男女疗养院，有病床60张。每年夏季，凡有结核病等需要长期休养者在此疗养，秋后直接回医院接受治疗。1949年后，山西省卫生厅接管该院，改名为山西省汾阳医院。

此外，太原博爱医院、太原若瑟医院、大同首善医院、运城福音医院等教会医院都在1949年后被人民政府接管，作为山西的现代医疗机构，现在仍在为山西人民服务。

第五，教会医院办医疗护理学校，或以带徒形式培养医生、护士，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医生及护理人员，为山西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人才。

太谷仁术医院1917年开始举办护士学校，共办护士班20期，毕业学生数百人。除留在仁术医院工作外，许多人还服务于省内及华北一些医院。^④

1920年前后临汾新建女医院。院内附设三年制医学班，招收中学毕业的教徒子女学医，先后办四、五期，培养造就了一批掌握新医疗技术和新医药的专业人员。^⑤

^① 《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184页。

^③ 《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第190、200、216页。

^④ 《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239-240页。

^⑤ 李百玉：《临汾市志》海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页。

大同首善医院 1924 年开办护士学校，培养出百余名学生。^①

平定友爱医院在 20 世纪 30 年代培训乡村医生。该院从高小毕业生中择优录取到医院护士学校学习，然后资送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培养，再转入正规化教育。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②

1924 年公理会汾阳医院附设护士学校，护士长孔美玉兼校长。该校前后培养护理人员百余人，多数留在汾阳医院工作，少数服务于其他医院，个别的在外开设诊所或药房。^③

据统计，教会医院所办的护士学校，到 1951 年被接管前，共毕业学生 1192 名。^④

此外，教会医院还由外籍大夫招收青年，边工作边学习，以带徒弟方法培养出一些医生、护理人员。如仁术医院韩明卫收刘瑜、张履祥为徒，传授西医，教以各种剖腹、割症手术。汾阳宏济医院也曾以带徒的形式，培养过护理人员。^⑤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作用来看，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确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西社会医疗卫生功能的不足，并推动了该功能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变迁。

（三）灾荒救治功能的变迁与提高

近代山西灾荒不断。据张杰编的《山西自然灾害年表》（山西地方志委员会 1988 年出版），近代山西主要发生旱灾，1840~1949 这百余年中，全省性的大旱有 20 多个，即平均 5 年就有一次大旱；被旱灾县份 5 个以上的年份有 34 个，即每隔 3.2 年就有 5 个以上的县要遭旱灾。另据统计，1840~1911 年有旱灾 19 次，水涝洪灾 27 次，雹灾 14 次，蝗灾 13 次；1912~1949 年有旱灾 12 次，水涝洪灾 17 次，雹灾 8 次，蝗灾 7 次。^⑥由于传统赈灾功能的不足与衰落，几乎每次灾荒都对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小的破坏和损害。

传教士将赈灾看作“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手段”。每逢灾荒，他们都要拿出一定的钱、粮赈济灾民。例如：

在口外，1877 年陆殿英司铎接办而驾马梁之宣教工作，适值奇旱，陆殿英大施赈济。每人所得，几足一年之食。^⑦

在“丁戊奇荒”中，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在山西放赈银 120000 两，其中在太原放赈 86810.85 两，平阳府放赈 24090.12 两。^⑧

1913 年清源遭水灾，公理会募款救济。1914 年华北大旱，公理会在清源、太谷一带放赈救灾。1920 年山西旱灾严重，神召会在平定、榆次赈济灾民，施衣舍粥。1926 年吉县遭灾，内地会先后两次施放粮款。1928 年晋南持续旱灾，瑞华会在各地煮粥舍饭。芮城县教会还组织了“华洋义赈会”向教徒、灾民放赈款。^⑨

1929 年阳高遭罕见大旱，赤地千里，民尽啼饥；1939 年又暴雨成灾，房屋倒塌，农作

^① 大同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大同文史资料》第 17 辑，第 102 页。

^②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 57 辑，第 932 页。

^③ 《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 240 页。

^④ 《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第 527 页。

^⑤ 《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 239 页。

^⑥ 孙有福：《山西通志·民政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220 页。

^⑦ 常非：《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简史》第 43 页。

^⑧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第 112 页。

^⑨ 《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 221~224 页。

物欠收。阳高教堂的比利时神甫田种德曾大批发放救济，信教者不仅给大洋两元，儿童入校读书者每人三顿饭不要钱。浑源涧村等地于1939年遭水灾后，教堂神甫发放了一部分救济物资。怀仁县1929年遭灾后，城关总堂为饥民买米放饭。^①

教会的赈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山西社会赈灾功能的不足。传统赈灾措施的首要弊病是用来赈济的钱、粮极少，且沿用传统的赈灾思想。遇有灾荒时，政府只有消极的救灾措施，如赈济、调粟、养恤、安辑、蠲缓、放贷，既没有推行加强储备、改造水利设施、重视林垦等传统的积极的防灾措施；更没有能够推出新的、现代的防灾、赈灾措施。例如，1877年山西发生特大旱灾。由于交通闭塞，通讯落后，在清政府得到灾情消息时，山西已死了几千人。^②此次赈灾，起用工部侍郎阎敬铭，“设局平粟，设厂放粥，以工代赈，收养幼孩，掩埋恤赏”。省内、省外设立了近30个转运站，接转粮食。然而清政府的赈灾活动并没有阻止人口流亡，其主要原因是粮食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③官方沿用传统赈灾措施，给82个受灾县份的灾民提供月定量粮食，而不顾其实际所需。如徐沟县，政府每日给每个灾民一茶杯米，14文钱，儿童减半。^④政府所放赈粮共177万石（折合13275万公斤），而饥民多达五六百万人。即使按400万人计算，每人得到的赈粮也不过33公斤。^⑤政府的赈济不仅迟、少，而且极为混乱，根本没有秩序。“李提摩太看到太原地区赈粮发放的混乱，惊呆了。”至于许多偏远山区的灾民，根本就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据曾国荃、李鸿章估计，在一千五百万山西人中，至少有五百五十万人丧生，只有三百四十万人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资助。政府散粮要用土地来抵押。谷物不总是无偿散发的，要用土地作保，地价按收成好时计算，届时还不清所得谷物，将失去所抵押的土地。那些无地少地的农民无疑得不到政府的赈济。

与此相反的是，教会在近代山西的赈灾中，使用了系统的、有效的赈灾措施，缓解了灾情，救助了山西的大量灾民。例如，在“丁戊奇荒”中，针对官方赈济盲目、混乱的情况，外国传教士采取了经过详细调查、记录，把赈灾款发放给最需要的人的方法。“为了确定实际需要，且把赈济直接发给灾民，李提摩太挨门挨户分发赈款。”传教士们希望以此避免中国官员粗心的、不加区分的放赈方法。“在此次赈灾中，外国传教士在太原地区挽救了约40210人的生命，在平阳府，缓解了13537个家庭的灾情，挽救了29240人的生命。^⑥不仅如此，传教士还使用了具有现代性的赈灾方法，促使山西的赈灾功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以工代赈”本属传统赈灾方法，然而，将之用来修建公路则应是现代型的赈灾措施。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多数地方交通不便，太行山区之路更艰似蜀道。加之运载工具为驴、马、骡，运输条件极差。这正是“丁戊奇荒”造成惨重损失的原因之一，如果当时的交通条件好一点，能把粮食更多地运进来，或把灾民及时运出去，都不至于死那么多人。针对此情，教会在以后的赈灾中，采取了“以工代赈”修建公路的方法。如在1920年的大旱中，平定友爱会和“华洋义赈会”合作，花费40-60万美元，雇佣灾民修建了一条阳

^① 《雁北宗教志》第133页。

^②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前言。

^③ 侯欣圭：《山西通志·粮食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0页。

^④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第58页。

^⑤ 《山西通志·粮食志》第20页。

^⑥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第65、71、106、116、112页。

泉至辽县的沿太行山麓的盘山公路，完成了横贯南北之交通要道，救济了濒临绝境的广大灾民，不仅使沿线农民得到益处，也使山西的煤、铁能运出去，发挥作用。^①在此次灾荒中，汾阳公理会也用以“以工代赈”之法修建了汾军公路、汾太公路。汾军公路共用67.1万元，其中美国红十字会捐赈灾款27.1万元，美国咨询委员会捐助25万元，山西旱灾救济委员会捐助15万元。该路于1921年5月起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工程基本告竣，11月2日在汾阳举行“汾军公路落成开车纪念会”。山西旱灾救济会又赈款修筑了汾太公路，其中有华洋义赈会的工赈款7万元。两段公路合称太军公路，全长288公里。

同期，瑞华会和运城地方政府组织了华洋义赈金赈济灾民，还争得“华洋义赈总会”11万元的工赈款，修筑了运（城）茅（津渡）公路。

据资料记载，20世纪初由基督教会主持的用于山西修筑公路的赈灾款共达187万元，占山西全省10年修路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②而且在工赈筑路中，对老弱残疾者给予一定的施舍，对有劳动能力者不空施金钱，不空发粮食，需从事相当的工作，才支付相应的工钱；缺粮灾区，以粮食折付工资，工资按施工单位核实发给。教会的这种赈灾方法，不仅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而且改善了山西的交通条件，使山西的煤、铁能运出去，给山西带来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粮、款运入山西，这样即使发生大旱灾，也不会再出现“丁戊奇荒”中那样的凄惨景象。这是一种积极的、从根本上缓解灾荒问题的措施。

传教士还在总结山西传统赈灾措施弊端及他们所用的有效、新型的赈灾措施的基础上，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除灾荒之根源、中西结合防灾、赈灾的现代防灾、赈灾思想。例如，在“丁戊奇荒”的赈灾中，李提摩太发现清廷官员只是在灾荒发生后才注意赈灾，却不管灾荒形成的根本原因。为此，他提出了从根本上去灾、防灾的思想。“所谓灾荒，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前提，而引起人对于其自身以外之各种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从而招致之物质上的损害。”^③灾害之发生，与其说是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因此灾荒是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的。“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目睹了中国传统赈灾措施的缺点，他们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全新的赈灾措施——不仅仅是从远方获得漏斗般的援助这样一种集权型计划，而是积极的发展经济建议，简而言之，现代化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去除灾荒的成因。”李提摩太提出的防灾措施有：控制自然，应用新的农业技术，发展工矿业，发展交通通讯事业。^④他还为官绅讲解有关的科学知识。他翻译的《农学新法》也介绍了农业化学知识，^⑤以合理利用水利、土壤等自然条件，发展农业，改善生态。

传教士还主张中西团结起来共同防灾、赈灾。李提摩太认为中国的赈灾只有靠中西联合行动才能有效地完成，他希望中西双方密切合作，发展现代赈灾方法和防灾措施。^⑥这种国际合作防灾减灾的思想，无疑具有现代性。总之，李提摩太等传教士采用的赈灾方法、提出的防灾、救灾思想是促使山西社会灾害防治功能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① 《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57辑，第928、933页。

^② 《山西基督教社会事业述略》第222~223页。

^③ 邓云特：《中国灾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第63页。

^④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第81、148页。

^⑤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625页。

^⑥ 《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第127页。

结语：近代山西传统农业文明衰落，战乱频繁，自然灾害严重，毒品问题猖獗，导致了社会物质生活贫困，精神生活困乏，教育、救治等功能低下。在此情况下，部分山西民众感到传统信仰中的诸神失灵。对于他们而言，传统信仰已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感召力，因而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遂在山西立足并发展起来。基督教在山西的传播虽然引起过激烈的民教冲突，但也造成了山西传统社会结构分化这一最早的现代化变迁。它还将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技术、工具、作物品种、娱乐活动传入山西，推动了山西农林牧业生产的早期现代化改造，促使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开始了现代化变迁。教会对吸毒、缠足等恶风陋习的冲击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减少了山西迈向现代化的困难和阻力。教会的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及赈灾事业使山西社会的教育功能、医疗卫生功能及赈灾功能有所增强，并促进了这些功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近代山西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启动、推进了山西社会的早期现代化。

参考文献：

（一）主要史料：

1. 李金华：《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赵政民：《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出版。
3. 各县文史资料。
4. 近年新修各县县志。
5. 山西部分县、市的民族宗教志。
6. 老年教徒的口述史料。
7. 《山西通志》第1~50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1999年出版。

（二）参考书目：

1.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4. 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98。
6.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7.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
8. 司德敷：《中华归主》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7。
9. Paul Richard Bohr：《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The U.S:Harvard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1977。
10. 李斌：《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
11. 柴莲馥：《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12. 戴存义著、刘翼凌译《席胜魔传》香港：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3。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编：《教务教案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4~1981发行。
14. 爱德华兹著、李喜所等译：《义和团时期的山西传教士》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5. 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6. 罗荣渠等：《现代化研究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18. 龚书铎：《中国社会通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
19.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20.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1. 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2.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致谢

我跟随王守恩老师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年来，王老师在学业、生活方面给予我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他的谆谆教导和不断的鼓励，使我坚定了完成学业的信心；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宽厚谦和的处世风格，使我受益匪浅。师母给予的关爱同样终身难忘。

两年前，王老师帮我选定基督教在山西传播状况及其影响的研究方向，随后的范式选择、资料收集、写作修改和最后的定稿都得到了王老师的精心指导。在此，谨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行龙老师、郭卫民老师、岳谦厚老师、王先明老师等在论文开题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深表感谢。

感谢山西省宗教处李玉印处长、太原基督教会，太谷教徒张忠、王景荣及太谷县、临汾市、襄汾县宗教局的领导给我提供资料。

还要感谢三年来给我关心和帮助的历史系、图书馆、研究生处各位老师，你们的善意帮助我珍藏在心。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论文中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